

## 《臺灣政論》的初步分析 —以「自由化」、「民主化」和「本土化」為中心

許瑞浩

### 摘 要

《臺灣政論》是國民黨政府遷臺後，臺灣第一本由本土菁英創辦並主導的政治性異議雜誌，也是往後一系列黨外政論雜誌的源頭，本文擬對其做初步分析，重新檢視它的歷史地位。本文共分五節，第一節是前言，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主要以一九七〇年代臺灣整體環境開始朝有利於「自由化」、「民主化」與「本土化」的方向變遷，其間的過程為主軸，從經濟、社會、國際情勢及國內政局等面向，分析《臺灣政論》的時代背景。第三節由創刊、成員、內容、發行及停刊等角度進行內部分析。第四節則透過異議媒介的角色與功能，以及對民主運動的參與和影響，進行外部分析。第五節是結語，旨在綜合以上的分析，尋求《臺灣政論》在戰後臺灣民主運動的新定位，以及對現今臺灣民主政治的啟示。

**關鍵詞：**臺灣政論、黨外政論雜誌、自由化、民主化、本土化

# A First-step Analysis On *Taiwan Political Review* —on the basis of “Liberalization”, “Democrat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Xu Rui-hao

## Abstract

*Taiwan Political Review* is the first heretic political magazine run and owned by the local elites after the War. It is *Taiwan Political Review* that stimulates the birth of a series of other similar heretic magazines. I therefore would like to do an initial analysis on this magazine and re-evaluate its historical status. The paper is made up of five sections. The first section is Preface, showing my purpose and motivation. Section II is the discussion of the temporal background on *Taiwan Political Review*,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whole environments—including economic conditions, social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aspects and domestic political foresights—in Taiwan in 1970's when "Liberalization", "Democrat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start to take the ground. Section III works on the internal analysis of how the magazine is published, who are the pioneering members, what makes up the main contents and why it finally ends the publication. Section IV is the research on the external analysis, focusing on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the heretic political media, showing what the role they play in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and how strong influence they exert. Section V is the conclusion part : with the re-study of *Taiwan Political Review*, I try to re-evaluate the status this magazine plays in the post-war democratic movements in Taiwan as well as the political lessons we can learn to make better the democratization we nowadays have on the Treasure Island.

Key Words : Taiwan Political Review, Heretic Political Magazine, Liberalization, Democratization, Localization

## 《臺灣政論》的初步分析 —以「自由化」、「民主化」和「本土化」為中心

許瑞浩<sup>\*</sup>

在臺灣的言論史上，若以雜誌而論，……在不同時期擔負著反應民間輿論發言臺……在爭取自由與民主的實施上，同樣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臺灣政論》創刊詞

Knowledge is political, and politics is based on knowledge.

—Jens Bartelson (1995,5)

### 壹、前言

回顧戰後臺灣的發展歷程，除了創造舉世稱道的「經濟奇蹟」外，另一項政治自由化、民主化成功，建立華人世界第一個民主體系的「政治奇蹟」，或許更值得肯定。<sup>1</sup>這項成就，除了經濟、社會、國際環境的變遷等結構性因素外，主要歸因於以政治反對運動為主導的民主運動，持續不斷地發展，形成一股由下而上的壓力，促使長期一黨專政的威權體制政權從事改革，向民主轉型，終至和平達成政黨輪替，使臺灣邁進政黨政治的新時代。

黨外政論雜誌在戰後臺灣民主運動中向居重要地位，不惟宣傳理念，而且實際參與並帶動政治活動；既是民主運動的喉舌，也是手足，對臺灣的民主化具有全面性的影響與貢獻。《臺灣政論》是國民黨政府遷臺後，臺灣第一本由本土菁英創辦並主導的政治性異議雜誌，也是往後一系列黨外政論雜誌的源頭。而由《臺灣政論》結合的新一代本

<sup>\*</sup> 國史館助修

<sup>1</sup> Linda Chao and Ramon H. Myers, *The First Chinese Democracy: Political Lif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蔡玲、馬若孟著，羅珞珈譯：《中國第一個民主體系》（臺北：三民書局，民國87年10月）；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士菁英所從事的政治反對運動，向被視為黨外運動的起點。因此，《臺灣政論》極具高度象徵意義。

然而，在當今學界對戰後臺灣民主運動的研究中，《臺灣政論》似有一種被尊而不重的感覺，迄今尚乏專門且深入的研究。或許是發行期只有短短的五期五個月，似乎無法發揮立而明顯的實際作用；也可能因為在其前後的幾本重要異議政論雜誌及它們所引發的政治運動，如《自由中國》半月刊與「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大學雜誌》與政治革新運動，和《美麗島》雜誌與「美麗島政團高雄事件」等，均備受青睞，以致掩蓋了《臺灣政論》的光芒。<sup>2</sup>本文擬對《臺灣政論》做初步分析，並以此為基礎，重新檢視《臺灣政論》的歷史地位。

本文共分五節，第一節是前言，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主要以一九七〇年代臺灣整體環境開始朝有利於「自由化」、「民主化」與「本土化」的方向變遷，其間的過程為主軸，<sup>3</sup>從經濟、社會、國際情勢及國內政局等面向，分析在什麼樣的時代背景下，產生《臺灣政論》如此具有高度象徵意義的政論雜誌。第三節由創刊、成員、內容、發行及停刊等角度對《臺灣政論》進行內部分析。第四節則透過異議媒介的角色與功能，以及對民主運動的參與和影響，對《臺灣政論》進行外部分析，以究明《臺灣政論》除了高度的象徵意義之外，有否發揮實際作用。第五節是結語，旨在綜合以上的分析，尋求《臺灣政論》在戰後臺灣民主運動的新定位，以及對現今臺灣民主政治的啟示。

<sup>2</sup> 《自由中國》、《大學雜誌》和《美麗島》的相關專書及論文為數眾多，而且質與量均呈現與日俱增的趨勢，近幾年經常有推陳出新的研究。新臺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編：《珍藏美麗島——臺灣民主歷程真紀錄》（臺北：時報文化公司，民國88年11月），四冊口述史套書尤可為代表。

<sup>3</sup> 政治自由化、政治民主化和政治本土化是當代臺灣政治變遷的三個重要過程，同時也是《臺灣政論》最主要的訴求、目標和言論方向。本文也以這三個概念做為分析主軸，為了行文方便，一律加上括號（「」），且省略「政治」二字，未加括號者則指一般定義。在臺灣，「自由化」主要指涉的是保障個人與社會團體的基本自由與人權，如解除戒嚴，恢復言論、出版、集會及結社等自由，以及提升自主性和選擇權，擴大大元主義的影響力等等；「民主化」主要指涉的是保障公民的參政權，如回歸憲政，建立政黨政治，以公平且具競爭性的選舉成立向人民負責的代表性政府，並在擴大政治參與的過程中落實主權在民及政治平等的理想等等；「本土化」主要指涉的是本省籍民眾公平而有尊嚴地參與政治，如國民黨政府權力結構的多元化，國會改造，讓更多本土人士進入黨政高層分享權力並參與決策，以及政權的正當性和合法性逐漸由對全中國擁有主權轉變為對臺灣的有效統治等等。這三個過程經常是同時並進，相輔相成的。



## 貳、背景分析

《臺灣政論》創刊於1975年8月，〈創刊詞〉言簡意賅地說明了發行的緣起與背景：

今年真是個多事之秋。石油危機給予島內經濟沉重的打擊，至今尚無復甦的跡象。蔣公過世，中南半島潰敗，菲律賓、泰國與中共建交，一連串的事件，迫使我们面臨一個新的艱難的局面。……現在該是搭起民間輿論發言臺最適切的時候了。<sup>4</sup>

這段文字隱約透露時代遞嬗的消息，當時無論政治、經濟、社會或是國際局勢，都發生重大變化。《臺灣政論》趁勢應運而生，針對國民黨政府威權體制的結構性弱點進行了一次成功的「政治突破」（political breakthrough）。本節試就戰後以來國民黨政府威權統治的變遷，以及一九七〇年代臺灣整體環境開始朝有利於「自由化」、「民主化」與「本土化」的方向發展，致能提供反對勢力生存、發展和壯大的條件，其間的過程做為主軸，分別從經濟、社會、國際關係及政治等方面，探討《臺灣政論》創刊的時代背景。

### 一、國民黨政府的威權統治

戰後臺灣威權體制的建立，肇始並奠基於對日接收，<sup>5</sup>鞏固於國民黨政府的遷臺，<sup>6</sup>和東西冷戰的持續，並有效運作直到一九八〇年代中期解嚴前後，才開始向民主轉型。

臺灣威權體制的形成，是以一個「擬似列寧主義的黨國體制」（quasi-Leninist party-statesystem）為主導核心，<sup>7</sup>由「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和「戒嚴法」及其相關法令所構成的中央集權式非常體制，<sup>8</sup>與「侍從主義」（clientelism）<sup>9</sup>和「國家統合主義」（state

<sup>4</sup> 黃信介：〈我們想做的〉，《臺灣政論》，1期（民國64年8月，再版），封面內頁，創刊詞。

<sup>5</sup> 關鍵在於日本在臺灣所有的權力與資源的轉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權力與施政等。

<sup>6</sup> 關鍵在於國民黨政權的存續、中共的威脅及二二八事件的影響等。

參見龔宜君：《「外來政權」與本土社會—改造後國民黨政權社會基礎的形成》（臺北：稻鄉出版社，民國87年8月），頁37-42。

<sup>7</sup> Tun-jen Cheng（鄭敦仁），“The Politics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The Case of the East Asian NICs” Ph.D.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87, p.104.

<sup>8</sup> 事實上，是將內戰狀態制度化、常態化。在此非常體制下，可以維持龐大的軍隊和黨、情治、特務組織，對外應付中共的威脅與滲透，對內控制人民及社會團體，合法鎮壓一切政治反對運動。參見薛月順、曾品滄、許瑞浩主編：《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一）從戒嚴到解嚴》（臺北：國史館，民國89年12月），1、2章。

corporatism)<sup>10</sup>等政治機制搭配輔助，再加上最高統治者的個人意志、大中國意識型態與「一個中國」原則下的法統觀念為指導，並高度依賴美國的支持。

在威權體制下，國民黨政府的統治就形成一種國家機關對民間社會，由上而下的控制與支配。表現在政治上是對人民基本人權與基本參政權的限制；經濟上是對經濟活動和市場行為的管制與操縱；社會上是對人民團體和社會運動的動員與壓制；文化上則是對意識型態和教育、傳播體系的塑造與操控。<sup>11</sup>這樣的統治方式，自然是非民主、非自由的，也是不重視本土的；而且在許多方面限制一般人民的發展，尤其是對本土人士。因此，臺灣社會不斷出現反對的聲浪與行動，但由於國內外情勢一直有利於國民黨政府，且缺乏適合反對力量成長發展的條件，致使國民黨政府得以有效地鎮壓一切反對活動。這種情況到了一九七〇年代，隨著國內外政治、經濟和社會關係的演變，逐漸起了變化。國民黨政府的威權統治開始鬆動、軟化，並朝「自由化」、「民主化」和「本土化」的方向轉型。整個環境也漸漸變得對反對勢力有利。

## 二、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

### (一)經濟發展

國民黨政府雖然控制臺灣各類經濟活動，支配經濟發展的方向和型態，但卻是一種頗具正面效果的指導性干預。<sup>12</sup>再加上國際經濟景氣繁榮，世界市場規模擴張的結果，促成了臺

<sup>9</sup> 侍從主義是指：國民黨政府透過地方選舉，賦予地方派系壟斷地方政治經濟的權力，以交換地方派系的支持和效忠。Nai-tne Wu (吳乃德), "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 System: 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7, p.393; 林佳龍：〈威權侍從政治體制下的臺灣反對運動——民進黨社會基礎的政治解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卷1期（民國78年，春季號），頁117-143。

<sup>10</sup> 國家統合主義是指一種「黨—國—社會」關係的統合模式，也是一種利益匯集系統和利益代理模式，用來維繫與資本家和勞工之間的關係，並藉以操控農會、工會、水利會等民間團體，使民眾無法透過社會組織的力量來挑戰國家體制。參見Philippe C. Schmitter, "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 in P. C. Schmitter and G. Lehmbruch, ed., *Trend Toward Corporatism Intermediation* (Beverly Hill: Sage, 1979), pp.7-52.

<sup>11</sup> 蕭全政：〈臺灣威權體制轉型中的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收入中央研究院臺灣研究推動委員會主編，《威權統治的變遷—解嚴後的臺灣》（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民國90年3月），頁67。

<sup>12</sup> Robert Wade,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充分授權技術官僚執行長期計畫性經濟政策是重要關鍵。

灣經濟高度成長及快速工業化，並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成為國際經濟體系的一員，有助於「自由化」和「民主化」的發展。

### 1. 一九七〇年代以前的經濟發展

就方向和型態而論，一九七〇年代以前臺灣的經濟發展大概可分為三個階段：1948年至1952年是第一階段，主要在抑止通貨膨脹，改革金融，穩定經濟，並發展農業。<sup>13</sup>1953年至1960年是第二階段，以第一階段的農業發展為基礎，政府鼓勵私人投資勞力密集的輕工業，推行進口替代政策以保護國內產業，產品大部分是用來滿足國內的需求。政府在1958年改革匯率，貶值新臺幣，在1959年公布「十九點財經計畫」，以及在1960年制定「獎勵投資條例」，之後隨即進入1961年至1970年的第三階段，改採出口導向的工業化政策。期間，政府又推行一系列的財金改革與鼓勵方案，以提高工業生產，增加出口並滿足國內需求。六〇年代中期進入經濟起飛期，年平均成長率高達18.5%，外資開始大量湧入，1963年工業在國民生產淨值中所占的比重首度超過農業，1964年國際收支平衡第一次出現順差，最重要的是臺灣積極投入世界市場，成為國際經濟體系的一員。都市化、勞工階級、中小企業也都在這個階段開始蓬勃發展，臺灣也由農業社會轉型為工商業社會。<sup>14</sup>

### 2. 一九七〇年代的經濟發展

1971年開始進入另一個新階段，以資本密集的高科技和中小型工業為發展的重點，並逐步發展重工業。此時國內外的經濟環境已有所改變，如世界經濟成長趨緩，陷入短期不景氣循環，能源價格急劇攀升，全球性通貨膨脹，國際財政金融體系不穩定，再加上未開發國家的低工資競爭壓力，已開發國家的保護主義和區域化發展，並逐步要求臺灣經濟自由化、國際化、降低關稅及非關稅障礙等，都使臺灣經濟面臨重大危機，以致成長趨緩。<sup>15</sup>以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為分界，1964至1973年是「高度成長期」，1974至1979年則是「不穩定成長期」，1980年以後是「中度成長期」。

<sup>13</sup> 具體措施有財經方面的改革新臺幣、管制匯率、重訂關稅，以及農業方面的土地改革、肥料換穀、田賦徵實、農技推廣和農會改組等。

<sup>14</sup> 參見田弘茂：〈威權政黨國家的轉型—臺灣的發展經驗〉，收入張京育主編，《中華民國民主化—過程、制度與影響》（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民國81年3月），頁52。

<sup>15</sup> 一九七〇年代中期美國國會及行政部門要求臺灣經濟自由化、國際化，並關心臺灣的政治民主化運動。當時菲律賓、韓國亦受美國相同的壓力與影響。參見蕭全政：〈國民主義：臺灣地區威權體制的政經轉型〉，收入《中國的民主前途：臺灣地區政治民主化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財團法人民主文教基金會，民國80年3月），頁37-62。

臺灣在一九七〇年代初期的外交挫敗與石油危機的雙重衝擊下，工廠倒閉、大量失業、通貨膨脹、資金外流，眾多人民生活陷入困境，社會充滿焦慮和不安。政府在經濟方面的對策是：推動十大建設，加速農村建設、成立外貿協會，招徠外資，發展策略性工業，開闢科學工業園區，加強對中小企業融資，提升工業發展的技術與資本等等，並採取促成充分就業、經濟發展和出口擴張的凱因斯式保護政策，干預市場機能的運作，影響國內的經濟活動，以確保政治體制的穩定。<sup>16</sup>其中有許多是厚植臺灣根基的經濟本土化措施。

### 3. 經濟發展的影響

一九七〇年代上半葉的景氣蕭條是短期的，臺灣經濟的長期發展趨勢直到八〇年代仍是快速成長的。經濟成長使得人民的生活水準普遍提高，有助於維繫國民黨政權的穩定，但至七〇年代中期，國民黨已經是在變革中求穩定了。<sup>17</sup>經濟發展創造了國民黨政府無法控制的自主力量，私人企業成長，加上整體經濟繁榮，皆有助於降低個人和團體對國民黨與政府的依賴。此外，民間經濟發展所產生的大量私人財富，可以不受黨國控制，自由投入各種活動，包括支助政治反對運動。<sup>18</sup>

高棣民（Thomas B. Gold）指出，國民黨在領導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革方面取得令人讚嘆的成功，但也為其威權統治創造了消亡的條件。<sup>19</sup>白魯恂（Lucian Pye）也認為，臺灣可能成為由於經濟發展促成民主化及多元主義的興起，並從而削弱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威權統治基礎的最佳實例。<sup>20</sup>經濟發展為政治變革、社會變遷，以及「自由化」、「民主化」和「本土化」奠定基礎。

### （二）社會變遷

<sup>16</sup> 當時臺灣仍具國家主義式的政治經濟發展傾向，亦即國家安全與整體經濟發展並重。真正經濟自由化應該在一九八〇年代以後。

<sup>17</sup> Copper指出臺灣領導人試圖以經濟上的成就來彌補外交上的挫敗，經濟的快速成長，也緩和國內政治問題的嚴重性，維繫了臺灣政治體系的穩定。John F. Copper,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in Hungdon Chiu, ed., *China and Taiwan Issue* (New York: Praeger, 1979), p.49.

<sup>18</sup> 田弘茂：〈威權政黨國家的轉型—臺灣的發展經驗〉，收入張京育主編，《中華民國民主化—過程、制度與影響》，頁55-57。此外，由於排擠效應，本省人比較集中在私人經濟方面發展，使得臺灣興起大量的中小企業，而且在一九六〇年代中期開始蓬勃發展。經濟上的成就多少也轉移了對政治上的不滿。然而，逐漸興起的中產階級開始要求更多的政治參與。參見Allen Cole, "Political Roles of Taiwan Enterpriser," *Asian Survey*, 7: 9 (1967), pp.645-654.

<sup>19</sup> Thomas B. Gold,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1986), p.121.

<sup>20</sup> Lucian Pye,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Cambridge: Th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233.



隨著經濟發展，社會也相應加速變遷，總趨勢是「社會多元化」，包括社會結構的複雜性和異質性的遞增，社會規範和價值觀的分化，個人與團體自主性和選擇性的加強等，均成為「政治多元化」的基礎，對「自由化」和「民主化」產生關鍵性影響。另外，省籍關係由對立而緩和，並漸趨融合，以及本土人口的自然成長優勢，都有利於「本土化」。社會變遷的過程與面向非常複雜而多樣，無法逐一縷述。以下專就都市化與階層多元化為中心加以析論，因為這兩種變化與《臺灣政論》的創刊及政治反對運動的發展最有關係。

### 1. 都市化與教育普及

一九六〇年代由於經濟發展和工業化，促使鄉村人口往城市集中，開始出現都市化現象，及至七〇年代，都市化的程度益發顯著並產生實質影響。經濟成長帶來富裕，提高了生活水準，而社會的多元發展也使得人民的自主意識與權利／權力意識逐漸覺醒。政府的公能力與公信力已不足應付諸多新興社會問題，也無法滿足人民更高的期望和需求；同時公權力對社會的控制與國民黨對人民團體的操縱，也相對減弱。是故，以城市居民為主體所結集的民間社會力量，遂在七〇年代中期以後開始勃興，並逐漸突破國家機關的政經支配，而在一九八〇年代促成各種新興社會運動，這些社會運動又與政治反對運動合流，擴大了反對運動的社會基礎。<sup>21</sup>

再者，由於都市人口集中、交通便捷以及傳播網絡稠密，使得教育、知識、資訊及其他組織資源能擴散到更廣大的人口與範圍，也令媒體能發揮較大的影響力；再加上，義務教育普及，知識水準普遍提升等因素，皆使意見的表達與溝通變得更加頻繁而容易，人民參與政治的意願與能力也相應增強，結果促進了社會動員與「自由化」、「民主化」的發展。<sup>22</sup>黨外運動發軔於大都市，《臺灣政論》選擇創刊於臺北市，是有其結構性原因。

### 2. 階層多元化——勞工階級、中產階級與知識分子

在社會結構變遷的過程中產生了勞工階級與中產階級，這兩類在臺灣近現代史上從未出現過的社會階層。由於工業化的結果，工業人口自一九六〇年代中期起，即以驚人的速度大

<sup>21</sup> 參見高承恕：〈臺灣新興社會運動結構因素之探討〉，收入徐正光、宋文里等編，《臺灣新興社會運動》（臺北：巨流圖書公司，民國78年），頁9-19；蕭新煌：〈臺灣新興社會運動的剖析：自主性與資源分配〉，收入蕭新煌等著，《壟斷與剝削——威權主義的政治經濟分析》（臺北：臺灣研究基金會，民國78年），頁29。

<sup>22</sup> 王拓曾表示：「我們之所以能在實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條件上具備這種越來越成熟的條件，主要應該歸功於政府三十年來，普遍推行義務教育，以及無數的黨外政治人物在這三十年裡義無反顧，前仆後繼不斷奮戰中磨練出來的」。王拓：《黨外的聲音》（臺北：長橋出版社，民國67年），頁13。

量成長，逐漸取代農業人口成為最大的勞動人口。<sup>23</sup>勞工階級在七〇年代初期開始穩定壯大，並在社會運動與政治運動方面發揮集體的影響力。

中產階級是一九七〇年代的新興社會階層，對於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社會多元化的貢獻已廣受肯定。雖然成員之間仍有相當大的差異及矛盾，有些先進熱中於公共事務，有些又冷漠遲疑；既是執政黨及既有體制的擁護者，又是反對勢力及改革的擁護者。<sup>24</sup>但中產階級仍有一些共同特質，如較高的民主理念、較強的結社傾向與求新求變的心態等，都是促進「自由化」和「民主化」的重要因子。因此，中產階級可以同時推動國民黨的改革，以及政治反對運動和社會運動。

另一方面，由於生活水準與知識水準的提高，使得知識分子的人數在一九七〇年代初期快速增加，成為一種頗具規模及影響力的社會階級及社會力量。而且知識分子也較往昔更加關心和參與公共事務，從七〇年代中期開始發揮他們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影響力。<sup>25</sup>近期許多研究均指出黨外運動的支持者主要來自勞工階級、中產階級與知識分子。而且這三者之間隱約有一種分工：知識分子是主要的領導者與設計者、中產階級是主要的資源供應者、勞工階級則為主要的選民，共同構成反對運動的社會基礎。<sup>26</sup>

國民黨政府雖然以威權體制強力主導並形塑臺灣社會經濟發展的方向與型態，但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卻衍生出許多超乎國家體制所能解決的問題，同時也產生各種國家機關無法操控的自主力量，反過頭來衝擊威權體制使其產生變化。<sup>27</sup>

<sup>23</sup> 第一類行業（初級產業）勞動人口從1952年佔全部就業人口的56.1%，降到1975年的30.4%；第二類行業（工業）人口則從16.9%升至34.9%；第三類行業從27%升至34.7%。參見CEPD： *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1989*（Taipei：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Executive Yuan, 1989），p.16；王振寰：《誰統治臺灣？—轉型中的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臺北：巨流圖書公司，民國85年），頁64-65。

<sup>24</sup> 吳乃德、林佳龍：〈中產階級與民主改革：現實或神話？——重構中產階級與民主化的關係〉，收入蕭新煌主編：《變遷中臺灣社會的中產階級》（臺北：巨流圖書公司，民國78年），頁218-219；蕭新煌：《社會力—臺灣向前看》（臺北：自立晚報社，民國78年7月），頁43-45、385-386。

<sup>25</sup> 由於為數漸多的海外留學生與歸國知識分子，傳遞國外民主自由的思想與訊息，所產生的國際示範效應，也值得注意。例如引介世界各地持續發生的民主化運動，以及流行於一九六〇、七〇年代歐美社會各種爭取自由解放的反對運動等。

<sup>26</sup> 王振寰：〈臺灣的政治轉型與反對運動〉，《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卷1期（民國78年，春季號），頁95-97；及該文所提及的彭懷恩、林嘉誠、胡佛、游盈隆、張茂桂、林佳龍等人的論文。

<sup>27</sup> 參見杭之（陳忠信）：《邁向後美麗島的民間社會》，下冊（臺北：唐山出版社，民國79年4月），頁42；Thomas B. Gold,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 p.121.

### 三、國際局勢與國內政情

#### (一)國際局勢

##### 1.美「中」關係的新發展

在東西對抗的冷戰架構下，國民黨政府依恃美國軍事、經濟援助及在國際地位上的強力支持，才能同時應付中共的壓力，並以「一個中國」原則在臺灣建立威權體制，順利進行統治。及至一九七〇年代初期，臺灣、美國、中共的三角關係開始有了重大轉折。1971年，美國改變地緣政治的外交策略，尼克森政府宣布要與中共改善關係，次年尼克森總統訪問大陸，並於2月28日與中共總理周恩來共同發表〈上海公報〉，支持北京政府的「一個中國」政策，而且承諾將逐步撤離駐臺美軍。國民黨政府頓失依靠，在國內與國際上失去「代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正當性。

##### 2.退出聯合國及國際組織

在一九五〇、六〇年代，美國即不斷維護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及各國際組織的席位，阻止共產集團「排我納共」，隨著第三世界新興國家陸續加入聯合國，保衛席位日益困難，與中共改善關係後，美國就逐漸傾向不支持中華民國代表唯一中國。1971年10月，經聯合國大會表決，將中華民國蔣中正政府的代表排出聯合國，而由中共取代。其後，中華民國接連失去聯合國各附屬機構及其他國際組織的席位。

##### 3.與各國斷交

在美國態度轉變、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各國紛紛與中共建交。中華民國政府在「漢賊不兩立」的外交原則下，只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者，立即與其斷交。<sup>28</sup>日本於1972年與我斷交，截至1975年，與中華民國仍有邦交的世界大國只剩美國，有外交關係的鄰國只剩韓國。《臺灣政論》創刊前夕，西方民主陣營在中南半島潰敗，越南、高棉和寮國相繼淪陷

<sup>28</sup> 1971年斷交國家有奧地利、比利時、喀麥隆、智利、厄瓜多爾、伊朗、科威特、黎巴嫩、墨西哥、秘魯、獅子山、土耳其等十二國；1972年有阿根廷、澳大利亞、查德、盧森堡、馬拉加西、馬爾地夫、馬爾他、紐西蘭、盧安達、塞內加爾、多哥、日本、希臘、牙買加等十四國；1973年有巴林、西班牙、上伏塔、薩伊等四國；1974年有波札那、巴西、加彭、甘比亞、馬來西亞、尼日、委內瑞拉等七國；1975年有菲律賓、葡萄牙、薩摩亞、泰國、越南等五國。在一九七〇年代上半葉建交國家僅有1972年的東加一國。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波斷交潮所帶來的「骨牌效應」。

，共產勢力在亞洲迅速擴張，菲律賓、泰國與中共建交，美國承認中共的跡象日趨明顯等情事，無不令國內人心惶惶。

東西陣營的和解，促成臺灣國際地位的孤立，迫使臺灣政府與人民重新思考臺灣的定位，遂導致威權政府從事「本土化」改革，以及產生由《臺灣政論》開始，發自黨外勢力的一連串政治反應。

## (二)國內政情

美中（共）關係解凍，以及從1971年退出聯合國開始的一連串外交挫折，都威脅到中華民國代表中國的合法地位，國民黨的政權基礎遂發生正當性危機，轉而對內向臺灣社會尋求更大的支持；<sup>29</sup>再加上社會經濟結構的大幅變遷，國民黨必須面對整個臺灣社會，正視來自不同階層的廣大民意。因此，在一九七〇年代有一連串的政治革新，改變了整個政治環境，不僅促成《臺灣政論》創刊，也對「自由化」、「民主化」、「本土化」，以及反對運動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 1. 蔣經國的接班與威權體制的轉型

1975年4月，蔣中正逝世，象徵一個軍事強人時代的結束，臺灣也開始由「硬性權威體制」（蔣中正時代）逐漸向「軟性權威體制」（蔣經國時代）過渡，<sup>30</sup>最終向民主轉型（一九九〇年代）。就臺灣的例子而言，社會經濟發展固然是民主轉型的必要條件，而民運人士持續不斷努力所造成由下而上的壓力，以及國民黨領導者追求民主的決心，或許同樣重要。蔣經國的主要目的可能是以順應時勢及民意，來延續國民黨政權的命脈，但仍對民主化貢獻極大。<sup>31</sup>由於蔣經國積極主導與支持，國民黨內的「民主化」由上面有條不紊地開始，也間

<sup>29</sup> 王振寰在討論臺灣的政治轉型時曾指出，某些歷史情境可能使一個政權面臨正當性危機，而促使其進行政治轉型：第一，該政權強高度賴外國的支持與承認，一旦外國不再支持，隨即面臨正當性危機。第二，原本支持該政權的國內有力者不再支持，反而強烈要求改革。第三，由於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新的社會階級或力量，但此一新的階級或力量卻遭排擠無法進入既有的政治體制，因而挑戰該政權。是故一個政權面臨正當性危機，或其權力基礎發生動搖時，必須維持甚至強化原有的支持或尋求新的支持。第一、三項正是一九七〇年代臺灣政治變遷的主因。王振寰：〈臺灣的政治轉型與反對運動〉，《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卷1期，頁79-80。

<sup>30</sup> 蔣經國時代已經逐步放鬆政治管制，允許更多人參與政治，讓更多本土人士分享政治權力。dwin A. Winckler,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on Taiwan: From Hard to Soft Authoritarianism?" *The China Quarterly*, no.99 (September, 1984), pp.481-499.

<sup>31</sup> Yangsun Chou (周陽山) and Andrew Nathan, "Democratizing Transition in Taiwan," *Asian Survey*, 27:3 (March, 1987), pp.277-99. 該文分析蔣經國從1972年以來所扮演的角色，認為蔣經國的策略與操控，是影響臺灣走向民主化的主因。



接影響黨外的民主運動，使得國民黨政權不致因來自下面的政治反對壓力而崩潰，進而避免發生政治和社會的大動亂。<sup>32</sup>

蔣中正在生前已為蔣經國能順利接班鋪好路，<sup>33</sup>因此，應付一九七〇年代危機的任務，就由當時已掌握大權的行政院長蔣經國總其責。蔣經國推動一系列的政治、經濟改革，成功地解決了危機，也使政治環境逐步朝向「民主化」、「本土化」發展。

## 2. 政治改革與「本土化」

### (1) 黨、政革新

蔣經國在一九七〇年代推動的黨、政革新，是以「本土化」為主軸。重要的具體措施包括：一、大量吸收本省籍黨員，至1975年，國民黨本省籍黨員的人數已超過外省籍黨員的人數；二、拔擢本省籍青年才俊擔任重要黨職；三、提高內閣及國民黨中常會中本省籍人員的比例。結果，有更多本土人士擔任黨政高階職位，參與決策，分享權力；一方面提昇了本土人士對國民黨政權命運休戚與共的感覺，他方面也強化了統治的正當性。國民黨政權的正當性基礎逐漸由統一中國轉向立足臺灣，政策的重心也由專注國家統一轉向重視社會安定、經濟繁榮。

### (2) 舉辦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

增加本省及僑選中央民意代表的人數，不再增補大陸地區的名額，國會結構遂逐漸邁向「本土化」。但第一屆代表仍不改選，繼續行使職權，所以只是國會局部改革，有限度的「民主化」。

1969年，為維持合法人數，舉行中央民意代表增額補選，選出少數終身職的國會代表，黃信介當選終身職立法委員。1972年修改「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總統授權經由定期增額改選來增加國大、立委的席次，康寧祥當選增額立法委員。黃信介、康寧祥逐漸成為反對勢力中舉足輕重的人物，也是新一代的領袖。

### (3) 改革的影響

蔣經國主導的政治、經濟改革是成功的，個人的權位也因而得到鞏固和強化，1978年他當選中華民國第六任總統。但是這種政治改革只有促進「本土化」和「民主化」的效果，卻沒有進一步「自由化」。因為只是「體制內改革」，僅在權力接班過程中將硬性威權體制變

<sup>32</sup> Steve Tsang（曾銳生），“Chiang Ching-Kuo, the Nature of the Kuomintang and the Democratic Breakthrough in Taiwan”，收入中央研究院臺灣研究推動委員會主編，《威權統治的變遷——解嚴後的臺灣》，頁119-149。

<sup>33</sup> 黃嘉樹：《國民黨在臺灣1945-1988》（臺北：大泰出版社，民國83年），頁521-531。

得稍為柔軟而有彈性，並沒有放棄威權體制。而且政權也只是逐步向少數本土菁英開放，並未向全體民眾開放。沒有進一步「自由化」，只有部分「民主化」、「本土化」的原因是，蔣經國改革的目的是要穩定政權，而全面推動「自由化」、「民主化」與「本土化」仍非其時，且將危及國民黨的統治地位。在反對力量尚未因組織化而構成威脅之前，國民黨有絕對的能力操控民主的進程。

然而，政治參與既有更大的空間，將使人民更加期待「自由化」和「民主化」，進一步升高他們對政治參與和政治平等的要求。對這種有限改革及有限開放感到不滿的人，就可能投入反對勢力，張俊宏等人就是例子。

由以上的論述可知，1975年《臺灣政論》創刊前夕，國內外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均經歷重大變遷，國民黨政府威權體制的基礎也相應產生結構性變化，導致威權統治逐漸弱化，也使得臺灣整體環境開始朝有利於「自由化」、「民主化」與「本土化」的方向發展，致使反對力量能夠生長茁壯。

《臺灣政論》發行的客觀條件雖備，但仍須有主觀意願配合。無論是黃信介想要強化個人地位、康寧祥亟思連任立委，或是張俊宏有志從政，這三位《臺灣政論》的創辦人都希望能有一個站在臺灣人立場，以臺灣為主要考慮點，而能有效傳播自由民主思想，以及發表不同政治意見的管道。

#### 四、早期淵源

《臺灣政論》的創刊與一九七〇年代中期黨外勢力的崛起，除了反映上述國內外政治局勢和經濟社會結構的變遷外，同時也繼承戰後以來政治反對力量的遺續。其中又以同為異議性政論雜誌的《自由中國》與《大學雜誌》所傳揚的自由民主思想，及其所領導的政治運動最為重要，對《臺灣政論》的影響也最大。

##### (一)《自由中國》與「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

###### 1.《自由中國》的創刊與言論

《自由中國》半月刊為大陸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部分國民黨人如胡適、雷震等，於1949年12月在臺北創刊，辦雜誌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宣揚自由民主，以及反共。<sup>34</sup>最初頗受政府

<sup>34</sup> 胡適：〈自由中國的宗旨〉，《自由中國》，1卷1期（民國38年11月），頁2。《自由中國》的主要言論

支持，但當國民黨政權越顯威權，《自由中國》的主張卻越來越「自由化」、「民主化」，終於導致雙方關係破裂、對立；《自由中國》才成為戰後臺灣第一本真正具有影響力的異議雜誌，也是當時最重要的異議媒體。<sup>35</sup>另一方面，當「自由化」、「民主化」到一定程度，自然會觸及理論能否實踐的問題。雷震等人遂開始實際進行籌組反對黨的政治活動，以落實民主政治的理想。<sup>36</sup>

## 2. 「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

1960年的「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是「二二八事件」及國民黨政府遷臺後，臺灣第一次大規模政治反對運動，也是戰後臺灣民主運動的先驅。它結合了包括國、青、民三黨的大陸籍自由派政治菁英，以及本省籍地方政治領袖和社會菁英。倘要建立反對黨即需民意支持，但是一九五〇年代政府僅開放省級以下的地方性選舉，使得全國性反對運動難以產生。<sup>37</sup>再者，「中國民主黨」並未提出足以吸引廣大臺灣民眾的政治主張，而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也未臻成熟，國民黨政府更不容許威脅其政權的組織化反對勢力存在，組黨運動遂告失敗。

<sup>38</sup>從組黨運動可以看出：《自由中國》集團分子明白短期內無法反攻大陸的事實，因此要求政府在臺灣從事民主建設，並率先結合本土菁英以組黨方式實踐民主理念，似乎也反映一種「本土化」的必然趨勢。

1960年9月1日《自由中國》出完最後一期，同年9月4日被勒令停刊。雷震及《自由中國》的主要編輯傅正、經理馬之驊等人遭逮捕判刑。然而，《自由中國》所傳播的自由民主思想、所提出的政治議題、所表現的抗議精神以及所從事的政治反對運動，對往後的黨外政論雜誌和其他異議言論，不單深具啟發與示範作用，也有傳承關係，可謂典型在夙昔。<sup>39</sup>這種

---

與工作重點可參見雷震：〈我們五年來的工作重點〉，《自由中國》，11卷10期（民國43年11月），頁5。

<sup>35</sup> 錢永祥：〈自由主義與政治秩序：對《自由中國》經驗的反省〉，《臺灣社會研究季刊》，1卷4期（民國77年，冬季號），頁72-89。一九五〇年代主要的在野言論有一報三刊，即李萬居的《公論報》、雷震的《自由中國》、民社黨的《民主中國》、青年黨的《民主潮》，而以《自由中國》影響最大。

<sup>36</sup> 薛化元：〈《自由中國》雜誌歷史定位的再思考〉，收入歷史學會編，《史學與國民意識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民國88年），頁219-223。

<sup>37</sup> 《自由中國》罕見有關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的「本土化」主張，這是與自《臺灣政論》以來的黨外政治訴求最大的差異。另一項主要差異則是「臺灣意識」的有無。

<sup>38</sup> 《自由中國》、《臺灣政論》和《美麗島》都是起於國民黨政權面臨政治危機的間隙，並藉機壯大反對力量，也同樣在國民黨危機處理完畢後遭到剷除。

<sup>39</sup> 李祖琛：〈大眾媒體與政治反對運動〉，《中國論壇》，274期（民國76年2月25日），頁322；魏誠：〈民國四、五十年代臺灣政論雜誌的發展：《自由中國》半月刊內容演變與政治主張〉，國立政治大

傳承關係可從一九七〇、八〇年代黨外政論雜誌和黨外運動的政治訴求、《臺灣政論》創刊詞，以及《八十年代》出版《自由中國選集》等例子明顯看出。

## (二)《大學雜誌》與政治革新運動

《自由中國》停刊後，整個一九六〇年代就沒有大規模政治反對運動，僅有零星的抗爭，如本省籍地方政治人物在議會的反對言論、1964年彭明敏、謝聰敏和魏廷朝的〈臺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事件、<sup>40</sup>《文星》雜誌等。<sup>41</sup>直到七〇年代才有以《大學雜誌》為根基的政治革新運動。

《大學雜誌》創刊於1968年1月，1970年改組擴充後，網羅了當時臺灣學術、政治、企業界的新生代菁英上百人。在釣魚臺事件和退出聯合國等外交挫折，以及臺灣國際地位變動的衝擊下，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對政治社會的關心與參與急遽提升。《大學雜誌》即利用國民黨內部政權轉移的機會提出諍言，要求政府進行政治、經濟、社會等多方面的「革新保臺」。相較於《自由中國》專注原則性的政治問題，《大學雜誌》已逐漸落實到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等各個層面的具體問題，這點對同樣重視實際問題的《臺灣政論》，應有一定的影響。《大學雜誌》另一個重要影響是帶動一波校園運動，但在1973年2月，當局逮捕陳鼓應等人及「臺大哲學系事件」發生後，校園運動遂告消沉，《大學雜誌》也逐漸內縮為不具異議性質的刊物。<sup>42</sup>

《自由中國》和《大學雜誌》都對宣導自由民主理念，大有貢獻。然而，這些成就都建立在國民黨政權發生統治危機、與新舊勢力對峙或交替的空窗期。當蔣中正鞏固唯我獨尊的權力後，立即以高壓手段瓦解正在籌組反對黨的《自由中國》集團；蔣經國擺脫元老重臣的掣肘後，馬上設法分化解散規模擴張過大的《大學雜誌》。從《自由中國》和《大學雜誌》

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73年6月，頁120；錢永祥：〈自由主義與國族主義：兩種政治價值的反思〉，收入黃榮村等著，《邁向公與義的社會》，上冊（臺北：時報文化公司，民國89年2月），頁374。錢永祥認為《自由中國》所提列的一系列政治議題、及探討這些問題時所運用的概念、所鋪陳的價值、所劃定的基調與訴求，幾乎界定了後來近三十年臺灣社會的政治論述。

<sup>40</sup> 彭明敏：《自由的滋味》（臺北：彭明敏文教基金會，民國84年1月，再版），頁147-160。

<sup>41</sup> 《文星》雜誌創刊於1957年，1965年停刊，發行人蕭孟能，李敖主編。以討論文化問題為中心，宣揚自由主義，鼓吹西化，並抨擊國民黨的保守教條，曾對那一代的青年起了反抗性的啟發作用，李敖及主要作者柏楊皆曾因為發表反對國民黨的言論而鋃鐺入獄。

<sup>42</sup> 參見李筱峰：《臺灣民主運動四十年》（臺北：自立晚報社，民國76年10月），頁104-106；王杏慶：〈《大學雜誌》與現代臺灣：1971至1973年的知識份子改革運動〉，收入澄社編，《臺灣民主自由的曲折歷程》（臺北：自立晚報出版社，民國81年），頁375-394。



的事例可知，如果不在國民黨內部形成一個改革派，讓國民黨起了罅隙，民主自由就很難有發展的空間，因為當時黨外尚未出現足以抗衡或威脅國民黨的力量。既然無法在國民黨內部進行由上而下的改革運動，只好向基層反對運動發展，張俊宏、許信良等人即是如此。<sup>43</sup>

1973年初，《大學雜誌》集團開始解體，張俊宏參加臺北市「黨外四人聯合陣線」（其餘三人是王昆和、康義雄、陳怡榮），角逐市議員，但四人皆高票落選。推動和支持這次聯合競選的是現職立委康寧祥和黃信介，因而締造日後黃信介、康寧祥與張俊宏合作創辦《臺灣政論》的機緣。<sup>44</sup>

## 叁、內部分析

### 一、創刊

#### （一）創辦的經過

1975年，黃信介、康寧祥與張俊宏共同創辦《臺灣政論》月刊，5月向臺北市政府新聞處申請登記，6月通過，8月創刊。由黃信介擔任發行人，社長康寧祥，總編輯張俊宏（筆名張景涵），並聘請姚嘉文當法律顧問。<sup>45</sup>

《臺灣政論》如此迅速就獲准發行，頗出人意表，因為在當時申辦政論性雜誌已極為不易，更何況又是一本純由反對派人士發行的異議雜誌。首先，申請出版登記就很難過關，每遭當局藉故刁難。其次，招募成員也不容易，既不能隨便找人致遭出賣或滲透，值得信賴的人又不是個個都勇於露面，敢承擔大任。最後，要維持一份雜誌的生存亦非易事，除了要有充裕的人力和資金外，通常都要有民意代表做後盾，抵擋當局不時的干擾或施壓。是故，《臺灣政論》由具有公職身分的黃信介當發行人，康寧祥擔任社長，原來《大學雜誌》的編輯

<sup>43</sup> 參見新臺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編：〈張俊宏先生訪談摘錄〉，未刊稿。

<sup>44</sup> 李筱峰：《臺灣民主運動四十年》，頁114。

<sup>45</sup> 原本擬以《臺灣公論》作為雜誌名稱，但市政府官員認為「公論」不妥，要求更名，遂改以《臺灣政論》為名。自創辦乃至編輯、發行，康寧祥都積極參與並主導。由黃信介擔任發行人是因為他是終身職立法委員，有很高的政治社會地位及很好的經濟條件，有能力也願意捐出大筆資金支持反對運動。

張俊宏出任總編輯。第二期起又加入因政治案件坐監而甫獲減刑出獄的黃華，<sup>46</sup>以及剛在礁溪鄉長任內涉案而被停職的張金策（筆名金曲辰、金文吉），後來二人均受聘為副總編輯。

張俊宏認為《臺灣政論》得以順利完成登記，是因為康寧祥是與國民黨相處較好的反對人士。再者，《臺灣政論》由穩健的角度出發，並未計畫要發展成像《美麗島雜誌》那麼大的規模，而且敢參與的人也不多，所以當局才准許《臺灣政論》發行。<sup>47</sup>而當時行政院長蔣經國正逢繼承大位的關鍵時刻，力倡行政革新，並屢次公開表示希望聽取包括反對意見在內的各種建言，可能也是重要原因。<sup>48</sup>

## （二）發行的宗旨

黃信介在〈創刊詞〉中說明發行的目的與宗旨：

……在這一個新的艱難的階段裡，我們只看到執政方面的想法與要走的方向，而民間方面始終沒有一個園地來反應他們的要求和希望，若能匯聚廣大民眾的意見使官方與民間的反應得以交流配合，這對維持社會的生存發展必定會有好處的。現在該是搭起民間輿論發言臺最適切的時候了。

「臺灣政論」，是一份立場超然的民間刊物，它雖無任何黨派色彩，但卻可以包容各種黨派的意見，只要有益於國計民生，只要能促進大眾的安和樂利，不同的意見都可以在這裡充分的提出來討論，我們誠心地闢出這一塊園地，希望我們這種開朗的胸襟能博得朝野各階層人士熱誠的參與和支持，共同為我們的處境，為我們的將來，用我們的心血來灌溉它。<sup>49</sup>

並宣稱要繼承《自由中國》、《時與潮》、《文星》與《大學雜誌》等雜誌批評當道、爭取自由與民主的傳統，「在批判官僚制度的行徑上、在閉鎖的環境中所造成的諸種不合理的事象」，發揮「掃除髒亂」的功能。<sup>50</sup>

<sup>46</sup> 黃華於1975年7月中出獄，8月中加入《臺灣政論》，第二期開始編輯、撰稿。黃華先生於2001年5月24日接受筆者口述歷史訪問時表示，他希望鼓勵政治犯出獄後繼續參政，乃身先試法。

<sup>47</sup> 參見新臺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編：〈張俊宏先生訪談摘錄〉，未刊稿。

<sup>48</sup> 蔣經國曾宣稱：「希望聽不同的意見，而且還要聽反對意見」，「無話不可明告（說），無事不可明講（告）」，一再表達尋求諍言的意願；郭雨新：〈談促進議會功能與社會和諧〉，《臺灣政論》，2期（民國64年9月），頁10-11；黃華：〈減刑人的信心〉，《臺灣政論》，3期（民國64年10月），頁39-40；莊伯仕：〈我們的新聞自由〉，《臺灣政論》，4期（民國64年11月），頁22。

<sup>49</sup> 黃信介：〈我們想做的〉，《臺灣政論》，1期，封面內頁，創刊詞。

<sup>50</sup> 同上註。

編輯部也表明編輯的態度和方向是，「誠實誠懇的反映民間的意見，使民意的管道得以流暢，而使社會能趨和諧」。<sup>51</sup>

## 二、成 員

《臺灣政論》的主要成員黃信介、康寧祥、張俊宏、姚嘉文、黃華和張金策，全是土生土長的本省籍知識分子或地方政治人物，而且都對國民黨政府持批判反對的立場（見表一）。雜誌的創辦、編輯、發行、對外關係、參與政治活動等，皆由本土人士主導。是故，《臺灣政論》在組織上關係比較緊密，在思想和行動上也比較一致，容易發揮集體的力量。<sup>52</sup>

表一：《臺灣政論》主要成員簡介

姓 名	籍 貫	時年(歲)	學 歷	重 要 經 歷
黃 信 介	臺 灣	四十七	臺灣省立行政專科學校行政系	市議員、立法委員
康 寧 祥	臺 灣	三十六	中興大學法商學院行政系	市議員、立法委員
張 俊 宏	臺 灣	三十六	臺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	《大學雜誌》編輯暨發行負責人
張 金 策	臺 灣	三十五	淡江大學中文系	礁溪鄉鄉長
黃 華	臺 灣	三十五	海軍士官學校	因政治案件坐獄多年
姚 嘉 文	臺 灣	三十六	臺灣大學法律系	律師

說明：1.資料來源：引自李筱峰：〈臺灣政治革新運動與知識份子〉，收入氏著《進出歷史》（臺北：稻鄉出版社，民國81年10月），頁196，表8。

2.據原表略作更改，如黃華時年應為三十五歲，原表作二十五歲。

<sup>51</sup> 〈編者的話〉，《臺灣政論》，1期，頁2。

<sup>52</sup> Berman由組織的角度來比較與《自由中國》一九七〇年代和一九八〇年代的黨外政論雜誌，認為：《自由中國》集團成員的背景、省籍及世代都有一定程度的差別，同時文章大多由編輯部以外的人撰寫，且多從學術角度討論政治，感興趣的是整個中國的問題，與臺灣民眾普遍缺乏感情與實務的聯繫。如此鬆散的體質無法取得長足的組織發展。一九七〇年代和一九八〇年代的黨外政論雜誌都是以一個組織嚴密的小集團為核心，成員大多是屬於同一代的臺灣青年，其中不乏地方政治人物，傾向運用實際的方法改變政治結構，並且大量使用雜誌作助選工具，宣傳各種改革理念。Daniel K. Berman, *Words*

韋政通曾分析：「……它〔《臺灣政論》〕的組成份子中包括發跡於民間的政治運動家和知識份子，這種在野的『力』與『理』的結合，也預示臺灣的自由民主運動即將面臨一個新的轉變」。<sup>53</sup>地方政治人物較缺乏以理論說服或吸引支持者的能力，知識分子則缺乏群眾基礎，兩者的結合可以取長補短，產生新的能量，促發新的政治運動。

康寧祥在擔任另一本重要黨外政論雜誌《八十年代》的發行人時，曾回憶：

藉著《臺灣政論》這個橋樑，在從民國五十八年的幾次選舉以來，已經形成的新生在野政治人物，與從《大學雜誌》時期政治改革運動分化出來的知識分子，才得以結合，這個結合使黨外的力量、素質提高了……。<sup>54</sup>

由於地方政治人物的參與，使得雜誌與反對運動的訴求、主張、策略和手法都較為務實；知識分子的加入，則提高了政治反對運動的素質。<sup>55</sup>再者，相對於其他社會群體而言，知識分子具有較大的言論自由，正如張茂桂所形容的：

在政治自由化之前，普遍缺乏公共論域的環境裡，相對於不能動員的其他社會部門，「知識份子」受到較大之容忍，常成為社會議題的界定者、受壓迫者的代言人，以及是非價值觀的評論者。<sup>56</sup>

《臺灣政論》開創了一個本土人士集體藉雜誌論政參政的新局面，也使戰後臺灣政治反對運動進入一個以本土人士為主體並主導的新階段。

### 三、內 容

*Like Colored Glass—The Role of the Press in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Westview Press Inc., 1992) 包澹寧著、李連江譯：《筆桿裡出民主——論新聞媒介對臺灣民主化的貢獻》（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84年3月，初版），頁298-299。

<sup>53</sup> 韋政通：〈三十多年來知識份子追求自由民主的歷程——從《自由中國》、《文星》、《大學雜誌》到黨外的民主運動〉，收入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主編：《臺灣地區社會變遷與文化發展》（臺北：中國論壇雜誌社，民國74年10月），頁369-370。

<sup>54</sup> 編輯部：〈中國民主運動發展史(二)——臺灣部分〉，《八十年代》，4卷1期（民國71年2月），康寧祥座談會發言部分。

<sup>55</sup> 《臺灣政論》除了平民主義的主要傾向外，某些言論在相當程度上代表當時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張俊宏稱為「中智階層」）的利益，同時也具有些許地方主義的色彩（相對於中央的國民黨政府而言）。參見陳鼓應：〈臺灣新生一代的改革運動（中）〉，《中報月刊》（民國71年6月），頁33。

<sup>56</sup> 張茂桂：〈「知識份子」與社會運動〉，《變遷中臺灣社會的中產階級》（臺北：巨流圖書公司，民國78年），頁191。



《臺灣政論》是國民黨政府遷臺後，臺灣第一本由本土菁英創辦的政論雜誌，也是在當時「大中國意識」仍然高張，不容輕易挑釁之際，第一本敢以「臺灣」為名的異議性政論雜誌及異議媒體；<sup>57</sup>同時又是本土人士第一次有系統、有目標、有計畫地集體表達對國事和政情的看法。它的內容與訴求是否有特殊之處，值得深入研究。

### （一）言論的主要方向

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曾指出1950年後，在臺灣的思想市場（ideological marketplace）上已流行各種不同的思潮。其中，「中國式的自由主義」和「臺灣獨立運動思想」兩種政治思潮，對臺灣政治最具批判性和評估性。一九七〇和八〇年代紛紛出籠的政論雜誌，即以這兩種政治思潮做為立論根據，形成一股嚴厲批評政府的風潮。<sup>58</sup>《臺灣政論》同時受到這兩種政治思潮的影響。另一方面，一九七〇年代臺灣整體環境開始朝有利於「自由化」、「民主化」與「本土化」的方向變遷，《臺灣政論》起於這個過程，其言論的主要方向也正好是「民主」、「自由」與「臺灣問題」。

《臺灣政論》每期封面都有一把象徵自由的火炬和一支代表廣播的麥克風，結合起來就如〈創刊詞〉所揭示的，要繼承《自由中國》與《大學雜誌》等政論雜誌的遺續，「搭起民間輿論發言臺」，對外公開傳播「爭取自由與民主」的言論。第二至四期的封底都印有「臺灣——你愛我愛大家都愛政論——你論我論大家都論」的標語，第五期的封底則印上「民主・自由・人權永遠放出光芒！」。由此可知，「民主」（「民主化」的要求）、「自由」（「自由化」的要求）與「臺灣問題」（「本土化」的要求）是《臺灣政論》言論的重心和主要方向。事實上，大部分文章的內容也都是環繞這三個主題而展開的。<sup>59</sup>《臺灣政論》固

<sup>57</sup> 《臺灣政論》甫創刊不久，即有人對「臺灣」二字相當敏感，很不以為然，《臺灣政論》，2期，頁3。〈編者的話〉；另外從第二期起，各期「讀者論壇」均有文章論及此點。

<sup>58</sup> Thomas A. Metzger, "The Chinese Reconciliation of Moral-sacred Values with Modern Pluralism: Political Discourse in the ROC, 1949-1989," in Ramon H. Myers, ed., *Two Societies in Oppositio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fter Forty Years*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1), pp.3-56; 蔡玲、馬若孟著，羅珞珈譯：《中國第一個民主體系》，頁77-78。Metzger所指的「中國式的自由主義」，早期是以胡適、雷震、殷海光等《自由中國》集團的知識分子為代表，後來由楊國樞等人承續其一貫思想及主張；《大學雜誌》顯然是受「中國式的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而「臺灣獨立運動思想」則是以彭明敏等人為代表，以建立代表臺灣人民的臺灣共和國為目標；自《臺灣政論》以下的一九七〇和八〇年代的黨外政論雜誌或多或少都受其影響，或直接間接反映這種思想。

<sup>59</sup> 參見歐陽聖恩：〈無黨籍人士所辦政論雜誌在我國政治環境中角色功能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75年。王甫昌認為《臺灣政論》和《美麗島》雜誌以民主做為訴求的主軸，

然是以民主自由做為訴求的主軸，但仍不掩其對臺灣主體意識的提倡，惟在當時國民黨政府「大中國意識型態」宰制全局的壓力下，必須委婉表達。

## (二)代表性議題

《臺灣政論》每期文章大致分成「專論」、「放眼世界」、「政情評述」、「大眾心聲」、「人物介紹」、「草野閒話」和「讀者論壇」等類目，涉及的層面相當廣泛。第五期為配合選舉，特別推出「選舉特大號」，增闢「選舉專欄」；又因國外讀者訂戶及投稿增多，另闢「海外心聲」。細究其內容，約略有下列幾項代表性議題：<sup>60</sup>

### 1. 批評時政，提出建言<sup>61</sup>

《臺灣政論》每期都以大量篇幅，從各種角度，舉各類事例抨擊時弊，批評政府，範圍遍及內政、外交、經濟、社會、教育、民生等方面，層次含蓋從地方到中央，包括由實際行政到政策擬定的權力行使問題，最終觸及政治體制的權力來源與安排問題。雖然也批評基本國策，且偶爾質疑政權的合法性，但更多內容是要求改革，而非革命，並提出具體可行的建議和方案。

《臺灣政論》既未直接攻擊黨政高層而威脅到他們的威信和權位，亦無明顯鼓吹取而代之的主張。基本上，對政府的態度，類似《自由中國》及《大學雜誌》所扮演的角色，比較像忠誠的反對者。

### 2. 批判國民黨

每期皆有多篇文章批判國民黨，主要指陳國民黨一黨獨大幾近專政，且以黨領政，造成黨政不分，從而建構黨政軍警特一元體制，妨礙民主政治的正常發展，也暴露出對實踐民主承諾的虛矯而無誠意。另外，明白指出國民黨只不過是一個民間政治團體，不應過度發展其特殊地位，享有一切特權。又多次論及要實踐真正的民主，須有健全的政黨政治，應有兩個以上的大黨或勢力相當的政治團體，處於平等地位互相競爭、監督與制衡；故主張建立有力

王甫昌：〈臺灣反對運動的共識動員：1979至1989年兩次挑戰高峰的比較〉，收入《臺灣政治學刊》，創刊號（民國85年7月），頁129-209。

<sup>60</sup> 張炎憲指出《臺灣政論》的言論大致有下列幾個面向：1.開始思索臺灣未來；2.批判大中國意識；3.批判一黨獨大，主張政黨政治；4.主張新聞自由；5.選舉言論可以批評國策；6.主張解除戒嚴。張炎憲：〈美麗島事件與臺灣民主運動的轉折〉，「邁向二十一世紀的臺灣民族與國家」研討會論文（民國88年12月21日至23日召開於臺北國家圖書館會議廳），頁5-7。

<sup>61</sup> 有關批評時政、批判國民黨、提倡民主與法治及保障自由與人權的言論散見各篇文章，限於篇幅，無法一一列舉。

的反對黨（在野黨），進而透過選舉制度達成政黨輪替。

《臺灣政論》也對國民黨政府的施政與權力結構做理性的分析，並批判它的權力根源及基礎——「大中國意識」，不同於爾後許多黨外政論雜誌專注於對國民黨的「扒糞」（muckraking）工作。

### 3. 提倡民主與法治

民主是《臺灣政論》最重要的訴求與內容，大部分篇文章都觸及到這個主題，說明民主化在理論上的優點與現實上的必要。《臺灣政論》特別從國會、選舉和司法三方面，討論如何落實民主政治。

#### (1) 國會

主張以定期改選及全面改選，來改造近三十年未曾改選，已無法代表民意的老舊國會；並健全議事規則，促進議會功能。

事實上，國會全面改選也是一種「本土化」，因為本省籍民的人口優勢必然使得臺灣地區代表名額相應持續增加、且讓更多的本省籍代表進入國會，進而導致更多本土人士能夠參與決策並分享權力，以及政權的合法性基礎逐漸由全中國轉向臺灣。

#### (2) 選舉

要求公正、公平、公開的選舉；並健全選舉法規，嚴懲如賄選、非法助選、脅迫、誹謗等違法情事。<sup>62</sup>並批判國民黨介入民間團體如農會、商會漁會的內部選舉，企圖完全操控各類民間社團的人事。<sup>63</sup>

#### (3) 司法

主張黨政不干預司法審判，以確保司法的公正獨立；摒棄人治，取消特權，樹立法治精神，建立守法社會。

### 4. 保障自由與人權

<sup>62</sup> 如張景涵：〈變局裡該怎麼辦？〉，《臺灣政論》，1期，頁10-11；朱文伯：〈我對「開大門走大路」的看法〉，《臺灣政論》，1期，頁13-14；朱文伯：〈談談公職選舉的公正、公平與公開〉，《臺灣政論》，2期，頁23-26；朱文伯：〈增選立委的檢討〉，《臺灣政論》，3期，頁23-26；朱文伯：〈纏小腳式的選舉〉，《臺灣政論》，4期，頁26-28，及《臺灣政論》，5期的社論、「選舉專欄」所收的各篇文章，頁11-30，等篇。

<sup>63</sup> 如黃順興：〈從農會選舉看民主法治〉，《臺灣政論》，2期，頁51-53；吳臺豐：〈高雄縣商會改選紀實〉，《臺灣政論》，2期，頁57-59；關佳明：〈狂妄的地方黨官〉，《臺灣政論》，5期（民國64年12月），頁57等篇。

要求政府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與人權，如憲法所列舉的人身、居住、遷徙、言論、著作、出版、通訊、信仰宗教、集會及結社等自由，以及平等權、生存權、工作權、請願權、訴訟權、選舉權、應考試服公職等權利，盡皆論及。並特別說明做為民主政治基石的新聞、言論自由的重要性，<sup>64</sup>也例舉國際社會重視及維護人權的案例。<sup>65</sup>最後歸結於呼籲早日解除戒嚴。<sup>66</sup>

#### 5.分析國際情勢，汲取各國經驗

這類文章大多刊載在「專論」或「放眼看世界」的專欄中，藉由對世界局勢及各國國情的評述及分析，一方面有助於了解臺灣的處境，<sup>67</sup>他方面也可從國際經驗中獲得正面示範<sup>68</sup>或負面教訓。<sup>69</sup>中心論點則在強調民主政治不僅最能符合國家利益及增進人民福祉，同時也是反共的最佳利器。在國內貫徹真正的民主政治，修明內政，爭取國民支持，建立鞏固的反共「心防」，<sup>70</sup>才是處在共產主義勢力不斷擴張的國際變局中，最有效的生存自保之道。

<sup>64</sup> 林海：〈新聞自由與言論報國〉，《臺灣政論》，2期，頁39-41；莊伯仕：〈我們的新聞自由〉，《臺灣政論》，4期，頁22-25，等篇。

<sup>65</sup> 如李聲庭：〈比利時三個無業遊民〉，《臺灣政論》，4期，頁29-30；逸鵬：〈國際上人權的維護〉，《臺灣政論》，4期，頁54-55；李聲庭：〈「人權」受國際的保護〉，《臺灣政論》，5期，頁42-43，等篇。

<sup>66</sup> 張聲：〈早日解除戒嚴〉，《臺灣政論》，5期，頁35-38。

<sup>67</sup> 如康寧祥：〈如何促進臺灣的進步與和諧〉，《臺灣政論》，1期，頁4-6；秦珍豐：〈韓國的未來情勢〉，《臺灣政論》，1期，頁19-21；陳新君：〈看美國的外交動向〉，《臺灣政論》，1期，頁33-34；丁一均：〈菲泰的疏美路線及其前途〉，《臺灣政論》，2期，頁44-48；葉落：〈福特和解政策的一連三炮〉，《臺灣政論》，3期，頁46-48；李慶榮：〈虎視眈眈下的國際和平局面〉，《臺灣政論》，5期，頁54-56，等篇。

<sup>68</sup> 如楊庸一：〈挪威的國民健康保險〉，《臺灣政論》，1期，頁31-33；陳卯龍：〈戴高樂—法國民主共和制度的維護者〉，《臺灣政論》，2期，頁26-31；金曲辰：〈裕仁天皇訪美〉，《臺灣政論》，4期，頁53，等篇。「國際示範效應」，是指思想、觀念、行為、事件等，可以透過傳播媒介，讓不同國家或地區的人民得以接觸，進而學習、模仿。當代媒體逐漸有「全球化」的趨勢並產生「國際示範效應」，參見Ammabelle Sreberny-Mohammaadi,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James Curran and Michael Gurevitch, ed., *Mass Media and Socie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p.118-136.

<sup>69</sup> 如陳新君：〈印度的政治危機〉，《臺灣政論》，2期，頁48-49；王憲國：〈孟加拉悲劇的再現〉，《臺灣政論》，3期，頁49-50；洪白：〈一個有自尊的人〉，《臺灣政論》，4期，頁67-68；周鍾靈：〈西班牙危機的啟示〉，《臺灣政論》，5期，頁53，等篇。

<sup>70</sup> 張景涵：〈變局裡該怎麼辦？〉，《臺灣政論》，1期，頁42。

## 6. 反映社會問題，關心弱勢群體

例如為雛妓、婦女、<sup>71</sup>農民、漁民、<sup>72</sup>都市「無殼蝸牛」、眷村居民<sup>73</sup>等弱勢群體代言，描述他們不幸的境遇、反映現實社會中諸多不公、不義、不合理的現象，以及因政府不當施政或施政不當所造的社會問題，要求政府關懷與重視一向受其漠視的社會底層人民的生活與權利。《臺灣政論》具有濃厚的平民主義的色彩。

## 7. 重視臺灣問題與強調臺灣主體意識

這類文章甚多，主要是從三方面來探討：

### (1) 關心臺灣的發展與前途

要求政府認清現實處境，以更務實的態度面對變局，調整既不切實際又長久不變的反攻大陸國策，重視在臺灣的各項建設與發展。並呼籲民眾以關懷鄉土的心情，思考臺灣的未來，共同為臺灣的前途努力。<sup>74</sup>

### (2) 尊重本土人士的地位與權利

辨明本土人士受省籍歧視的事實，要求無差別待遇。並提醒當局，本土人士發展機會的不平等，將妨害社會的團結、和諧與進步。<sup>75</sup>

### (3) 介紹臺灣歷史與文化

介紹臺灣歷史與歷史人物，如蔡惠如、林幼春、蔣渭水、郭國基等人，並鼓吹重視本土

<sup>71</sup> 如張義：〈販賣人口、逼良為娼的驚人案件〉，《臺灣政論》，1期，頁7-12；陳太太：〈做太太的該怎麼辦？〉，《臺灣政論》，2期，頁64-65，等篇。

<sup>72</sup> 如金曲辰：〈臺灣農民的憂慮〉，《臺灣政論》，2期，頁32-35；陳意：〈貓羅溪事件〉，《臺灣政論》，2期，頁56-57；張道江：〈官家違約佃農敗訴〉，《臺灣政論》，2期，頁61-62；王拓：〈八斗子所見、所思、所聞——小事情所反映的大問題〉，《臺灣政論》，1期，頁46-51，等篇。

<sup>73</sup> 如何文振：〈臺灣大地主〉，《臺灣政論》，3期，頁15-19；何文振：〈被漠視的一群〉，《臺灣政論》，4期，頁37-45；郭雨新：〈被遺忘的社會——人道主義所不能容忍的軍眷村問題〉，《臺灣政論》，5期，頁51-52，等篇。

<sup>74</sup> 如康寧祥：〈如何促進臺灣的進步與和諧〉，《臺灣政論》，1期，頁4-6；張景涵：〈變局裡該怎麼辦？〉，《臺灣政論》，1期，頁7-12；黃華：〈減刑人談國是〉，《臺灣政論》，2期，頁42-44；金文吉：〈破除幻想·面對問題〉，《臺灣政論》，3期，頁12-14，〈和傅聰、柳教授一夕談〉，《臺灣政論》，5期，頁31-34，等篇。

<sup>75</sup> 如康寧祥：〈如何促進臺灣的進步與和諧〉，《臺灣政論》，1期，頁4-6；姚嘉文：〈一八六比一的差異——高普考還要論省籍嗎？〉，2期，頁14-21；王春逢：〈是機會公開與平等的社會嗎？〉，《臺灣政論》，3期，頁20-23；姚嘉文等：〈高普考的配額——再論「高普考還要論省籍嗎」〉，《臺灣政論》，4期，頁31-36；林福：〈與青年學生一夕談〉，《臺灣政論》，4期，頁62-63，等篇。

文化。<sup>76</sup>

《臺灣政論》以較不著痕跡的方式表對達臺灣問題與臺灣主體意識的重視。它所呈現的臺灣主體意識，雖不似1964年彭明敏、謝聰敏和魏廷朝的〈臺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sup>77</sup>，以及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分別在1971年、1975年和1977年發表的〈國是聲明與建議〉、〈我們的呼籲〉、〈人權宣言〉，<sup>78</sup>那般昭然若揭，但透過持續而集中的宣揚，仍起了相當程度的作用。

#### 8.其他

對教育、<sup>79</sup>財政、經濟、<sup>80</sup>外交行政、<sup>81</sup>民間團體<sup>82</sup>等方面的問題，均有多篇文章加以探討，從這些文章的內容可以看出《臺灣政論》所涉及的層面十分寬廣、深入，而且相當實際。《臺灣政論》文章的理論層次與體系固然不及《自由中國》與《大學雜誌》那般高明嚴謹，但其整體風格，如觀點、主張、所討論的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的方法，卻更為務實。《臺灣政論》還與讀者一同思考民主政治與民主運動的實質問題，如效果、影響、未來發展方向等，使讀者更具參與感、認同感。

#### 9.異見

<sup>76</sup> 如正宏譯：〈日本人眼中的臺灣抗日運動〉，《臺灣政論》，4期，頁48-52；葉榮鐘：〈臺灣民族運動的舖（鋪）路人——蔡惠如〉，《臺灣政論》，1期，頁52-54；凡夫：〈臺灣民族詩人——林幼春〉，《臺灣政論》，3期，頁67-69；凡夫：〈革命家蔣渭水〉，《臺灣政論》，5期，頁76-79；蘇萬華：〈民主鬥士郭國基〉，《臺灣政論》，5期，頁80-85；胡筱玉：〈可敬萬沙浪〉，《臺灣政論》，4期，頁31-36，等篇。

<sup>77</sup> 彭明敏：《自由的滋味》，頁147-160。

<sup>78</sup> 原載於《臺灣教會公報》，1230期，民國64年9月28日；《臺灣教會公報》，1329期，民國66年8月16日。收入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資料中心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社會關懷文獻1971—1988》（臺北：人間出版社，民國87年9月），頁2-18。

<sup>79</sup> 如一群教員：〈機器能製造愛心嗎？〉，《臺灣政論》，3期，頁57-59；陶失淵：〈中學教師在校七小時實不合理〉，《臺灣政論》，3期，頁59-61；葉知秋：〈國中教師何去何從？〉，《臺灣政論》，4期，頁60-62；葉落：〈教育會議的矛盾和缺點〉，《臺灣政論》，5期，頁58-59，等篇。

<sup>80</sup> 如孫建國：〈當前臺灣經濟的危機〉，《臺灣政論》，1期，頁17-18；孫建國：〈臺灣的經濟問題——還是繫於政治的解決〉，《臺灣政論》，2期，頁12-14；孫建國：〈小百姓看大鈔〉，《臺灣政論》，3期，頁23-27；胡嘯譯：〈經濟危機中臺灣的調整〉，《臺灣政論》，3期，頁37-39；沈萍譯：〈資本主義能否生存下去？〉，《臺灣政論》，3期，頁41-45，等篇。

<sup>81</sup> 如周曉平：〈三寶大使〉，《臺灣政論》，3期，頁56-57；謝天成：〈可嘆外交部〉，《臺灣政論》，5期，頁6-61，等篇。

<sup>82</sup> 如王文燦：〈民間團體該怎麼辦？——從農會總幹事聘派糾紛說起〉，《臺灣政論》，3期，頁31-37。



《臺灣政論》政論每期也刊登多篇立場不同的「異見」文章，<sup>83</sup>雖然許多讀者認為不必浪費這塊寶貴的園地與篇幅和這些異見周旋，但《臺灣政論》仍秉其一貫的宗旨與立場予以刊載。<sup>84</sup>正如編者所言：

我們非常希望使本刊維持一種表達民間獨立輿論的純淨立場，但我們更覺得以身作則培養一種容忍異己接納異見的民主素養和雅量，甚至比傳播民主思想更為重要。<sup>85</sup>

《臺灣政論》秉持自由主義的精神，包容各種黨派不同的意見，如國民黨的吳延環、青年黨的朱文伯，統派或左派的陳鼓應，王拓、蘇慶黎、陳玉璽等，都曾參與撰稿。<sup>86</sup>這種兼容並蓄態度，在《美麗島》雜誌時期，曾一度出現過，再往後的黨外雜誌立場就比較分歧了。<sup>87</sup>

對於《臺灣政論》的內容，呂亞力曾做過扼要的評論：

臺灣政論文章的品質一般都相當高，故該刊的發行不僅給予反對黨影響新興中產階級有效的工具，而且使社會大眾相信其為一個值得信任的負責團體。此外，該刊把政治體系與政策作深刻的檢視，並按民主價值作批評，此使得執政當局承受相當的壓力。<sup>88</sup>

<sup>83</sup> 最明顯的例子是吳延環所撰的數篇文章，及其引發的筆戰。吳延環：〈論變局〉，《臺灣政論》，2期，頁22-23；吳延環：〈論國會〉，《臺灣政論》，4期，頁46-47；吳延環：〈論異見〉，《臺灣政論》，5期，頁46-47；阿土伯：〈給吳老先生的信〉，《臺灣政論》，3期，頁69-70；向東進：〈美酒異味〉，《臺灣政論》，4期，頁69-70，等篇。各期的「讀者論壇」也登載多篇「異見」文章。

<sup>84</sup> 「『臺灣政論』，是一份立場超然的民間刊物，它雖無任何黨派色彩，但卻可以包容各種黨派的意見，只要有益於國計民生，只要能促進大眾的安和樂利，不同的意見都可以在這裡充分的提出來討論，……」。黃信介：〈我們想做的〉，《臺灣政論》，1期，封面內頁，創刊詞。

<sup>85</sup> 《臺灣政論》，4期，頁70，編者按語。

<sup>86</sup> 但也有例外，例如李筱峰先生於2001年6月13日接受筆者口述歷史訪問時表示，他曾寫過一篇批判基督教的長文，張俊宏卻以長老教會對臺灣貢獻很大為由，不予刊登。黃華先生於2001年5月24日接受筆者口述歷史訪問時也承認，他自第二期起開始擔任編輯，曾經篩汰左派的文章。陳鼓應也認為，黃華在第二期加入後，雜誌的風格有做一些調整。參見新臺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編：《走向美麗島——戰後反對意識的萌芽》（臺北：時報文化公司，民國88年11月），頁175，李筱峰訪問部分；同上書，頁97，陳鼓應訪問部分。當然，一份刊物不可能沒有立場，或沒有擇稿的標準。

<sup>87</sup> 編輯部：〈黨外雜誌的昨日、今日、明日——總評黨外十本刊物〉，《夏潮論壇》，總號第49號（民國73年10月），頁7。

<sup>88</sup> 呂亞力：〈臺灣的反對黨：民進黨的發展〉，收入張京育主編：《中華民國民主化—過程、制度與影響》，200。

#### 四、發行

《臺灣政論》每月發行一期，自1975年8月創刊至同年12月停刊，總共發行五期。編輯部就設在姚嘉文的住處，社址暨發行部則設在黃信介重慶北路的家中，由蘇定祝擔任總經理，負責發行業務。三榮美術印刷公司印製，老闆張榮華是黃信介的老友，後來《美麗島》雜誌也由他承印。

隨著臺灣教育水準的提升與文化人口的增加，相應擴大了對報章雜誌等出版品的需求，同時也拓展政論雜誌的市場。因此，當《大學雜誌》轉型為不具批判性的一般刊物後，《臺灣政論》適時問世填補了政論雜誌市場的空虛，一時之間造成轟動，甫出刊發行量就扶搖直上，並持續增加，第一期就再版五次，而12月出版第五期時正值選舉期間，銷售量更增至約五萬份，且約有兩千份的海外訂戶。<sup>89</sup>實際的讀者人數應該是發行量的好幾倍，因為黨外雜誌私下流傳的情況相當普遍。

另一方面，撰稿投書者每期都有增加，讀者來電去函表示鼓勵和支持的也與日俱增，<sup>90</sup>使得《臺灣政論》的成員不致感到曲高合寡，或是唱獨腳戲，放言空論，而不被接受。《臺灣政論》大受歡迎，反映出一股來自民間的力量逐漸形成，使從事民主運動的反對派人士了解他們並非孤立無援，而是有許多志同道合者，更有來自社會大眾的支持，甚至有來自海外讀者的支持與鼓勵。<sup>91</sup>

#### 五、停刊

##### (一)停刊的原因

傳播媒體是現代社會中一般人民獲得資訊的主要來源，具有引導輿論，製造輿論的功能。此外，媒體反映政治過程，也參與建構政治現實。國民黨深知媒體的力量，所以透過國家機器的運作，以正式（如法令）或非正式的手段，設法操控各類媒體，壟斷傳播資源。<sup>92</sup>對

<sup>89</sup> 《臺灣政論》，5期（民國64年12月），封底內頁列出美國、加拿大的經銷代表共十一處。另參見王拓：《黨外的聲音》，頁83，訪黃信介；李筱峰：《臺灣民主運動四十年》，頁116。

<sup>90</sup> 黃信介：〈我們的態度〉，《臺灣政論》，4期，頁2。

<sup>91</sup> 新臺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編：《走向美麗島——戰後反對意識的萌芽》，頁219，張燦鑒訪問部分；頁222，陳唐山訪問部分；頁234，尤清訪問部分。

<sup>92</sup> 傳統中國政府、民初政府及大陸時期的國民黨政府都有查禁書報等限制言論自由的作為。而傳播媒體

於異議媒體性質的黨外雜誌，當局透過要求登記、審查、查禁、扣押、沒收、勒令停刊、盯緊印刷廠、巡邏書報攤發行據點等種種手段，設法管制發行，<sup>93</sup>使其有限度的流通於反對派人士及少數讀者之間，而不致因發行量增加，讀者變多，擴張雜誌的影響力，同時又可造成黨外人士的財務損失。<sup>94</sup>

《臺灣政論》在國內外的發行量都大幅增加，讀者反應熱烈，雖然正反面評價咸有，但亦顯示影響力與日俱增，普遍受到各界重視。如此高漲的聲勢，當然會引起國民黨政府高層的高度關注。<sup>95</sup>另外，在言論尺度上，由於當時行政院長蔣經國等政府官員再三表達尋求諍言的意願，頗能激勵發言，<sup>96</sup>讀者也對《臺灣政論》的論政頗表激賞；《臺灣政論》的言論漸趨大膽尖銳，特別是對現實政治的評論，一再提出向被視為禁忌的敏感話題，已直接擊中國民黨的要害。許多作者在文章中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戒懼不安的心境，讀者也擔憂並預卜《

在臺灣的發展自日治時代起即深受政治面與經濟面的控制，成為有利於統治階級的工具。

<sup>93</sup> 相關法令甚多，舉其大者如：1.「戒嚴法」第十一條及「臺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2.「國家總動員法」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3.「懲治叛亂條例」第六條、第七條，4.「刑法」第一百條，5.「出版法」及「出版法施行細則」等。負責的黨政單位亦多，舉其要者如：警總、新聞局、文工會、調查局、總政戰部、內政部（主管各警察機關）、國安局等。

<sup>94</sup> 書報審查制度也可能引起反彈，產生反效果如：1.民眾對政府和媒體失去信心。2.訊息和報導如果遭到控制或查禁，反而會格外受到注意。3.出版品越被查禁，銷路越好等。參見包澹寧著、李連江譯：《筆桿裡出民主——論新聞媒介對臺灣民主化的貢獻》，頁156-158；Carl Goldstein, "The Straight and Narrow: Newspapers Walk a Tightrope to Stay Clear of KMT Constraint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6 December 1985, p.27. 此外，我們都習慣將觀察的重點擺在國民黨政府如何動用「鎮壓性國家機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來對付黨外雜誌等政治反對活動，卻較少注意國民黨政府如何運用「意識型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與反對派做意識型態和理論上的對決。這應該是一個饒富意義且有趣的研究題材。

<sup>95</sup> 例如蔣經國及考選部均公開回應姚嘉文刊載在第二期質疑的高普考配合問題（〈一八六比一的差異——高普考還要論省籍嗎？〉）；蔣經國並在立法院親自說明農會總幹事聘派問題（余業華：〈農會總幹事介聘制度可以休矣！〉，3期；；王文燦：〈民間團體該怎麼辦？——從農會總幹事聘派糾紛說起〉，3期）、牛肉進口問題（關佳明：〈澳洲牛肉冷凍了我國的牧業〉，3期）。參見《臺灣政論》，4期，頁6，編者的話；姚嘉文等：〈高普考的配額——再論「高普考還要論省籍嗎」〉，《臺灣政論》，4期，頁31-36。

<sup>96</sup> 同註48。南方朔（王杏慶）指出蔣經國雖然致力政治的本土化和行政革新，「但他卻有著一個可能伺機而出的非民主心靈」。他特別引用蔣經國在1977年4月的一段公開言論：「今後對於別有用心的人要特別注意。假定一個人寫十篇文章，其中只有半篇不妥，就是以其他九篇半來隱藏他的罪惡」。南方朔：《民主不是夢》（臺北：新新聞周刊雜誌社，民國78年2月），頁24。

<sup>97</sup> 這些想法在《臺灣政論》的「讀者論壇」中俯拾皆是。

《臺灣政論》將以早夭的悲劇收場。<sup>97</sup>

《臺灣政論》言論與發行的影響力，尤其是結合本土人士集體力量參與政治的舉動，皆已瀕臨當道所能容忍的極限，也在考驗國民黨的耐心。威權政府對於零星的反對力量或異議人士或可勉予寬容，但對於集體的甚至是組織化的反對力量卻經常不擇手段地予以剷除。因為對前者的包容，可以向人民彰顯政府的仁慈與開明，或做為國際宣傳的樣板，藉以降低來自國內外要求「自由化」、「民主化」的壓力；但對後者的容忍，即可能導致政權的崩解。

適逢1975年底即將舉行第二屆立委增額補選，《臺灣政論》在12月發行第五期「選舉特大號」加以配合，幫助黨外候選人在文宣上對抗國民黨。同時刊載姚嘉文〈憲法與國策不可以批評嗎？〉、陳鼓應〈早日解除戒嚴〉及邱垂亮〈兩種心向——和傅聰、柳教授一夕談〉等極具挑戰性的文章。又有消息傳出，《臺灣政論》預定在選後出刊的第六期中，有文章提到國民黨選舉舞弊的情事，終於引發當局強烈不滿，決定展開鎮壓行動。<sup>98</sup>

## （二）停刊的經過

選舉結束後，在12月28日國民大會年終評議會上，有人質疑《臺灣政論》是被共產黨利用的刊物。臺北市政府新聞處以〈兩種心向——和傅聰、柳教授一夕談〉文中宣傳「臺灣人民要想『當家做主』，只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是在臺灣本土人民武裝起義推翻國民黨的獨裁政權，第二是臺灣人民團結起來奮鬥爭取早日和『祖國』和平統一」等言論，<sup>99</sup>涉嫌觸犯內亂罪及煽動他人觸犯內亂罪，情節嚴重，依據「出版法」予以《臺灣政論》停刊一年的行政處分。<sup>100</sup>

次年1月，又有三十五位立法委員向行政院提出質詢：「已有出版物，其言論逾越法律範圍，由臺北市政府依據出版法予以行政處分，至於有關人士，是否負有刑責，應請貴院分別查明依法處理，以明是非，而正視聽」。黃信介、康寧祥亦在立法院遭同僚圍攻。警總、國民黨文工會、國民黨社工會、國民黨臺灣省黨部、調查局等七個單位成立專案小組處理「臺灣政論事件」，最後決定辦人。<sup>101</sup>

<sup>98</sup> 參見李筱峰：《臺灣民主運動四十年》，頁116-117。

<sup>99</sup> 邱垂亮：〈兩種心向——和傅聰、柳教授一夕談〉，《臺灣政論》，5期，頁31-34。這樣的言論已嚴重挑戰國民黨的權威與意識型態。

<sup>100</sup> 張俊宏：《我的沉思與奮鬥——三千個煎熬的日子》（臺北：著者自印，民國66年10月，再版），頁145；葉柏祥：《黃信介前傳》（臺北：月旦出版社，民國83年6月），頁76。

<sup>101</sup> 張俊宏：《我的沉思與奮鬥——三千個煎熬的日子》，頁146-147；葉柏祥：《黃信介前傳》，頁76；

《臺灣政論》被停刊後，即不斷傳出當局要抓人的消息，黨外民主運動遭遇此番打擊暫時陷入低潮，而且人人自危。1976年1月《臺灣政論》駐北美地區總代表賴義雄等十五人發起簽名運動，要求臺灣當局保障言論自由。留學生同時在美國五個城市舉行示威遊行，包圍駐美大使館及五個領事館，呼籲政府以言論自由的角度來處理這個事件，並寫信給蔣經國，希望撤銷停刊處分，尊重《臺灣政論》成員及作者的人權，不藉故迫害或拘捕。<sup>102</sup>

當局有所顧慮，所以沒有大動作，主要負責人及決策者黃信介、康寧祥、張俊宏與姚嘉文均無事。但是，有政治犯案底的黃華仍於1976年7月遭到逮捕，送交軍事法庭審理，以「煽動他人觸犯內亂罪，情節嚴重」為由，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離上次減刑出獄甫滿一年。<sup>103</sup>同一期間，張金策停了許久的官司又被重新提出受理，這是一種警訊。1977年5月張金策在國內外友人協助下偷渡出境，流亡海外。<sup>104</sup>

最後引述一段張俊宏的回憶，或可做為《臺灣政論》從創辦到停刊的縮寫：

『大學雜誌』由上而下的改革運動撤退下來後，迫使我走向曠野、走向基層，游士跟游民結合——我開始結合在野勢力，藉由草根力量的結合，重新再起。『臺灣政論』剛好銜接著『大學雜誌』，以傳播工具重新凝聚改革力量，但『臺灣政論』已經是純臺灣本土、純基層的結合，一方面雖是坐而言，但其實已經是起而行——這些行動派的人並不是以「筆」為工具，而是以「口」為工具，藉著選舉推動改革，日後的反對運動差不多就此定型。一方面利用選舉期間進行社會運動，另方面勝選後以公職來保護雜誌，使雜誌能繼續成長。『臺灣政論』事實上是作為和平演變的工具在對抗國民黨。在辦『臺灣政論』時，不敢擴展得太快或太激烈，隨時都很警覺，從第一期到第五期的言論尺度都控制得很穩；但國民黨照樣把我們拔掉，因為他認為我們的氣勢太大了——第五期時發行量達五萬份。當『臺灣政論』聲勢日益高漲時，我們也討論過國民黨可能採取行

姚嘉文：《護法與變法》（臺北：長橋出版社，民國67年），頁42。

<sup>102</sup> 新臺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編：《走向美麗島——戰後反對意識的萌芽》，頁191，江春男訪問部分；張俊宏：《我的沉思與奮鬥——三千個煎熬的日子》，頁154；葉柏祥：《黃信介前傳》，頁77。《臺灣政論》和後來的黨外政論雜誌與海外臺胞之間的相互影響，以及海外臺灣人的組織和運動與臺灣島內民主運動之間的互動關係，都值得進一步研究。

<sup>103</sup> 參見新臺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編：《走向美麗島——戰後反對意識的萌芽》，頁86，張俊宏訪問部分；頁189-190，江春男訪問部分；黃華先生於2001年5月24日接受筆者口述歷史訪問紀錄。

<sup>104</sup> 同上書，頁87，張俊宏訪問部分；頁219，張燦鑒訪問部分。

動打壓，但我們當時真的一點辦法都沒有。<sup>105</sup>

《臺灣政論》雖然停刊，但積蓄已久的政治反對力量及反對意識，並未因此退縮或消泯，反而更加蓬勃發展，促使黨外運動邁向籌組政黨進行組織化對抗與群眾運動的新階段。

## 肆、外部分析

### 一、異議媒介的角色與功能

《臺灣政論》是一份雜誌，自然具備媒介的一般性質和功能，同時它又有高度的政治目的和動機，以及層次更高的政治使命，因此也積極從多方面投入民主運動。本小節即在檢視《臺灣政論》具有哪些異議媒介的特質和功能，而這些特質和功能又是如何發揮在推展政治反對運動，以及促進「自由化」、「民主化」。

#### (一)合適的媒介

在戒嚴時期，能從事政治反對運動的管道不多，主要透過參與選舉活動、擔任民意代表或行政公職，以及創辦異議媒體來進行。自國民黨政府遷臺以來，三次規模較大的政治反對運動都是以政論雜誌為中心而展開的。第一次是一九六〇年代初期由《自由中國》集團推動的「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第二次是一九七〇年代初期由《大學雜誌》集團促發的政治革新運動，第三次則是「黨外運動」。黨外運動肇端於《臺灣政論》的發行，而歸結於1986年9月臺灣第一個真正的反對黨——民主進步黨的成立，其間持續推展運動的正是一系列的政論雜誌。<sup>106</sup>

是什麼原因使得雜誌在眾多傳播媒體中獨受青睞，脫穎而出成為黨外時期表達反對意見的重要工具，甚至在某些時機或場合是唯一有效的異議媒介。我們可以從雜誌論政的傳統、雜誌本身的特質與政府控制的強度這三個角度來略窺究竟。

#### 1.雜誌論政的傳統

<sup>105</sup> 同上書，頁86，張俊宏訪問部分。

<sup>106</sup> 參見李筱峰：〈臺灣政治革新運動與知識份子〉，《進出歷史》，頁165-214。



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似有一種雜誌論政的傳統，在清末維新運動時期、<sup>107</sup>民初五四運動時期、<sup>108</sup>國民政府時期<sup>109</sup>和國共內戰時期，<sup>110</sup>都有許多政論雜誌成為傳播和啟蒙新思想，鼓吹政治改革、及倡導政治運動的主要媒介。國民黨政府遷臺後又有《自由中國》、《時與潮》、《文星》與《大學雜誌》等雜誌，都在不同的程度及面向上，成為《臺灣政論》的先例與範式。

## 2. 雜誌的媒體特質

比起報紙、廣播及電視等其他媒體，雜誌較具彈性和適應力。例如，雜誌沒有篇幅限制，而且使用較耐久的紙張印刷，除裝訂處外別無摺頁，適合私下流傳或複製等。<sup>111</sup>同時又可用不定期的出版及更換名稱等種種方式，因應當局對於查禁與否反覆無常的態度。<sup>112</sup>

## 3. 政府控制的強度

國民黨政府一向對其他傳播媒體、政黨、選舉等政治宣傳的媒介與方式，施以嚴苛的法令規範、嚴密的人員監視及嚴格的内容控制，相較之下雜誌所受的限制較少，自由度較大。可能因為政府認為，雜誌的讀者較少，因此對社會大眾的影響，對政權的威脅都比其他媒介小。另一方面，發行雜誌的資格也比較寬鬆，所需資源較少，可避免像報紙、廣播及電視等媒體一般，被國民黨藉由政經手段安排人事，進行間接控制。<sup>113</sup>

## (二) 傳播媒體

<sup>107</sup> 如梁啟超主編的《中外公報》、《時務報》、《清議報》、《新民叢報》，同盟會的《民報》等。

<sup>108</sup> 如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羅家倫、傅斯年等主編的《新潮》等。

<sup>109</sup> 如陳西滢、胡適等創辦的《現代評論》，胡適、傅斯年等創辦的《獨立評論》等。

<sup>110</sup> 如儲安平主編的《觀察》等。

<sup>111</sup> 包澹寧著、李連江譯：《筆桿裡出民主——論新聞媒介對臺灣民主化的貢獻》，頁288。

<sup>112</sup> 例如「備胎雜誌」：雜誌發行人同時申請登記若干個刊名，一個被禁馬上就更換另一個名稱，以因應當局連續不斷的書報審查，並保留原班人馬，以確保雜誌可以連續出刊而不斷期。這項策略在《臺灣政論》時期並未使用，然而在一九八〇年代以後發行的黨外雜誌就頻頻利用「備胎雜誌」應付當局的查禁或命令停刊，成為戰後臺灣政治反對運動與文化事業的一個特殊現象。

<sup>113</sup> 當局對報紙和廣播電視媒體的限制與操控，參見鄭瑞城：《透視傳播媒介》（臺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民國77年）；陳國祥、祝萍：《臺灣報業演進四十年》（臺北：自立晚報社，民國76年10月）；王振寰：〈廣播電視媒體的控制權〉，收入鄭瑞城、王振寰等合著，《解構廣電媒體——建立廣電新秩序》（澄社報告2）（臺北：允晨出版社，民國82年5月），頁75-128。

<sup>114</sup> 《臺灣政論》由於發行時間短暫，較顯現不出立即而具體的制衡效果，而一九八〇年代的黨外政論雜誌發行種類繁多，發行期長，總發行量又大，形成一股可觀的力量，是故明顯地兼具啟蒙與制衡的雙重作用。

《臺灣政論》作為一種傳播媒體對推動「自由化」、「民主化」，促進民主政治具有下列幾項重要功能：

### 1. 提供資訊

重點在解釋為什麼要民主和自由。《臺灣政論》藉由報導國內外政情，評析實行或未實行民主政治所造成的差異與利弊得失，並在事實上反映「自由化」和「民主化」的過程與結果，以及在理論上證明「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好處與必要，引發讀者對民主自由相關訊息的興趣和關注，同時強化對民主政治的信念。

### 2. 傳佈知識

重點在說明什麼是民主和自由，如何才能達到「自由化」與「民主化」。《臺灣政論》除了傳播民主自由理念和民主自由的相關知識之外，同時也教導讀者參與民主政治的知識與技巧，發揮了相當重要的啟蒙作用與教育作用。<sup>114</sup>這些均有助於提升社會大眾對民主生活方式的要求，進而參與建立民主體制的相關活動。

### 3. 塑造氛圍

重點在民主與自由的實踐。媒體塑造環境，也受環境塑造；塑造文化，也受文化塑造。此外，傳播媒體與社群的建立也有密切的關係，媒體的運作可以創造一個「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如政治社群。而這個「想像共同體」又可成為媒體發展的基礎，進一步相互影響，相輔相成。<sup>115</sup>《臺灣政論》發揮了媒體的輿論力量，致力且逐漸塑造出一個比較適合民主運作的環境，以及朝向「自由化」、「民主化」和「本土化」發展的社會氣氛；同時嘗試凝聚共識，形塑一個想像中的政治社群，在這個氛圍中從事民主運動。

### 4. 建立個人或團體的地位

傳播媒體可以促進個人或團體地位的合法化，也能賦予他們名聲，加強他們的權威，使得他們的意見和行動更具重要性及影響力，而且更受公眾注意。<sup>116</sup>傳播學者宣偉伯（Wilbur Schramm）曾表示媒體建立個人地位的功能不是只對當權者有利，而不利於變革。反之，它可以樹立改革者的地位，進而在建立地方領袖地位方面發揮正面作用。<sup>117</sup>

<sup>115</sup>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y: Reflection of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83), pp. 104-128.

<sup>116</sup> Paul Lazarsfeld and Robert Merton, "Mass Communication, Popular Taste and Organized Social Action", in Lyman Bryson, ed., *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 (New York: Institute for Religious and Social Studies, 1948), p. 101.

<sup>117</sup> Wilbur Schramm, *Mass Media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in the Developing*

《臺灣政論》對於黃信介、康寧祥、張俊宏及姚嘉文等人個人地位和影響力的增進，及黨外勢力或組織的建立與擴大，均起了相當重要的正面作用。<sup>118</sup>另一方面，《臺灣政論》也藉由樹立改革者的形象或團體的地位，或是不斷試探言論自由的界限、持續擴大問題的深度與廣度，製造了推動「自由化」、「民主化」與「本土化」變遷的壓力，全面發揮媒體加速變革的作用。

### 5.共識動員

政治反對運動是極具意識型態色彩的社群運動，能否持續發展並擴大規模，端視能有效動員多少支持者及潛在反對力量而定，<sup>119</sup>因此反對運動往往需要進行「共識動員」(consensus mobilization)。<sup>120</sup>共識動員的過程包括行動公開化、目標正當化、招募參與者、以及爭取支持者等。傳播媒體在這個過程中可以發揮關鍵作用，例如凝聚共識，整合力量，提供運動參與者和潛在支持者較完整「動員框架」(mobilizing frames)，使運動有目標、有方向等。<sup>121</sup>關於《臺灣政論》在共識動員乃至「行動動員」(action mobilization)<sup>122</sup>方面的作用，及其對反對運動的影響，下文將有進一步說明。

### (三)政治中介

#### 1.溝通管道

---

Countries(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135-136.

<sup>118</sup> 黃信介等人往後均成為黨外最重要的領導人。從《臺灣政論》開始，反對勢力也不斷茁長壯大，進而組織化、合法化，終至成立民主進步黨。

<sup>119</sup> 高承恕：〈臺灣新興社會運動結構因素之探討〉，收入徐正光、宋文里等編，《臺灣新興社會運動》，頁14。

<sup>120</sup> 王甫昌：〈臺灣反對運動的共識動員：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年兩次挑戰高峰的比較〉，《臺灣政治學刊》，創刊號，頁129-209。

<sup>121</sup> 「動員框架」或稱「集體行動框架」(collective action frames)，包括下列三個要件：1.將問題的本質和解決之道定義為集體的，而非個人的；2.設定抗爭對象，區分敵我；3.將不公平的現狀定義為可藉由抗爭者的集體行動加以改革或解決。針對這些框架要件，媒體可以發揮以下功能：1.建立運動的正當性，並向社會投射有利形象；2.傳播有利資訊；3.公開指認運動的抗爭目標和敵人，並置之於必須為問題或現況負責的地位。羅世宏：〈後蔣經國時代的國家、大眾媒介與反對運動：國家認同議題的媒介框架分析〉，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83年6月，頁35-36。

<sup>122</sup> Bert Klandermans 將動員分為「共識動員」和「行動動員」兩種。前者是指社會運動爭取一般人支持其目標與觀點的過程（亦即使民眾覺得社會運動有存在的必要），後者則指社會運動的團體組織邀請民眾參與社會運動的過程（亦即使民眾願意參加他們的活動）。王甫昌：〈臺灣反對運動的共識動員：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年兩次挑戰高峰的比較〉，《臺灣政治學刊》，創刊號，頁138。

從戰後臺灣政治反對運動的發展史來看，在國民黨政府與反對派（包括個人、團體和運動）接觸和協商的過程中，印刷媒體——特別是政論雜誌及少數報紙——率先成為中介，同時也是最重要的中介。廣播電視媒體一直要到解嚴以後，獲得解放，才逐漸發揮影響力。

《臺灣政論》做為一種媒介，其中一項最重要的目的與功能就在於，「匯聚廣大民眾的意見使官方與民間的反應得以交流配合」，成為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溝通的橋樑。<sup>123</sup>《臺灣政論》除了反映民意，伸張輿情外，也是黨外表達反對意見的新渠道，而且揭示將這種表達反對意見方式經常化、制度化的可能性。

## 2. 緩衝機制

《臺灣政論》被勒令停刊後，成員都感到恐慌，以為當局會大舉抓人。結果只有黃華、張金策出事，而負責領導與決策的黃信介、康寧祥和張俊宏都平安無事。一方面，或許是因為黃信介等三人擁有較高的政治社會地位與知名度，以及海外臺人的聲援和國際壓力，使得當局不敢隨便對他們動手。另一方面，作為當時黨外最重要代言工具的《臺灣政論》本身，似乎也起了相當程度的緩衝與替代作用。

包澹寧（Daniel K. Berman）認為黨外政論雜誌在反對勢力與政府之間起了相當重要的緩衝作用，代替面對面的直接衝突，當政府無法容忍過激的言論時，通常犧牲的只是雜誌，而不是個人或組織。<sup>124</sup>黨外政論雜誌以油墨代替流血，以「筆桿裡出民主」代替「槍桿裡出政權」。《臺灣政論》時期的情況大致如此，一九八〇年代以後，反對勢力與政府的互動關係也是如此。<sup>125</sup>

《臺灣政論》甫停刊不久，黃信介即有復刊的打算，但因黃華被判叛亂罪，依「出版法」規定不得復刊，遂作罷。又據黃信介回憶，國民黨為顧及國際形象，建議他另外辦一份雜誌，但言論不能過激，而且必須事先報備。雖然遭到黃信介拒絕，卻由此可見雙方關係並不緊張。<sup>126</sup>

<sup>123</sup> 黃信介：〈我們想做的〉，《臺灣政論》，1期，封面內頁，創刊詞。

<sup>124</sup> 包澹寧著、李連江譯：《筆桿裡出民主——論新聞媒介對臺灣民主化的貢獻》，頁319。

<sup>125</sup> 「美麗島事件」或許是個特例，但也讓當局深切體會「鎮壓成本」與「容忍成本」何者划算，因而對往後的反對運動傾向採取較為寬容的態度，未再有大規模的鎮壓逮捕行動。參見新臺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編：《暴力與詩歌——高雄事件與美麗島大審》（臺北：時報文化公司，民國88年11月）；呂秀蓮：《重審美麗島》（臺北：自立晚報社，民國80年12月）。

<sup>126</sup> 參見王拓：《黨外的聲音》，頁82-83，訪黃信介；葉柏祥：《黃信介前傳》，頁77。

## 二、對政治反對運動的參與和影響

黃信介、康寧祥和他們創辦的《臺灣政論》，一向被視為黨外雜誌的嚆矢，也是一種新的政治反對運動——黨外運動的先河。本小節旨在討論《臺灣政論》如何推動反對力量參與各項政治活動，在何種情況下以哪種方式參與，而這些政治參與又對以政治反對運動為主導的戰後臺灣民主運動，以及「自由化」、「民主化」和「本土化」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 (一)整合與動員反對力量

#### 1.整合與動員的目的

現代國家無論政府或是反對運動，都必須訴諸民眾的支持（或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所指稱的「同意」〔consent〕）及跟從（或「服從」），因此一方面需要建構民眾的集體身分與集體意識，另一方面又必須透過民眾的集體身分與集體意識取得統治或反對的正當性。<sup>127</sup>再者，在傳統中國，任何形式的政治對立，如菁英分子或社會大眾對政府的批評，在法律和文化上，從未能合法化。<sup>128</sup>是故，黨外的政治反對勢力必須進行一種有別於從前的新式整合與動員，以謀取反對運動的正當性及合法化，以爭取更廣泛的支持，進而建構組織和集體行動模式，並將之制度化，使反對人士與反對運動更能有效發揮集體的力量。

黨外政論雜誌在建構民眾的集體身分與集體意識、確立反對運動的正當性和合法地位、爭取民眾更多更普遍的支持與參與、以及建立集體抗爭的組織與模式等方面，均起了決定性作用，而自《臺灣政論》開始就一直積極在做這類的整合與動員。新崛起的黨外勢力與早期異議人士及政治反對運動最大不同就在於，《臺灣政論》以來的黨外領導者擁有較高明的組織技巧，而且更傾向於運用動員群眾的策略。

#### 2.整合與動員的基礎

《臺灣政論》最重要的訴求及內容是「民主」、「自由」與「臺灣問題」，而由這三個主題所衍生的政治意識——「民主自由意識」與「臺灣主體意識」，也就成為《臺灣政論》整合動員，參與各項政治活動，推動民主運動的共識基礎。後來黨外政論雜誌和整個反對運動的「共識動員」和「行動動員」，也是繼續以「民主自由意識」與「臺灣主體意識」為主要立論基礎，並以「民主化」、「自由化」和「本土化」為主要訴求和目標。

<sup>127</sup> 參見王振寰、錢永祥：〈邁向新國家？—民粹威權主義的形成與民主問題〉，《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0期（民國84年8月），頁22-26。

<sup>128</sup> 蔡玲、馬若孟著，羅珞珈譯：《中國第一個民主體系》，頁83。

藉由今日の後見之明可知，戰後臺灣政治反對運動爭取群眾支持和參與的基礎，主要是建立在對現有政權不夠民主自由的不滿，或是出於對族群待遇和地位不平等的不滿。<sup>129</sup>《臺灣政論》準確地察覺並彰顯這個現象，提出「民主化」、「自由化」和「本土化」，做為目標、方針與解決之道，為往後的民主運動（包括黨外運動）定下基調。另一方面，民主自由意識與「民主化」、「自由化」的訴求雖是反對運動初期最主要的訴求及共識，然而臺灣主體意識與「本土化」訴求卻後來居上，逐漸取得主導地位。由反對運動的支持者與參與者大部分都是本土人士來看，臺灣主體意識與「本土化」確實較具有共識動員的能力。<sup>130</sup>這在《臺灣政論》的成員與發行中，已現端倪。當然，《臺灣政論》主要還是以「民主自由」的共識整合動員支持者與參與者，尤其是針對外省族群。

### 3. 整合與動員的作用

一九七〇年代中期以前，本土的政治反對力量始終是零星分散的，以致無法對國民黨構成集體壓力，反而容易被國民黨各個擊破或分別收編。《臺灣政論》的發行，使反對力量開始有一個可資凝聚團結的中心，因而較能發揮集體力量。

《臺灣政論》自首期發行後，就一直受到許多正面迴響和熱烈好評，使得以《臺灣政論》為中心的反對派人士了解他們並不是孤單的，而是有許多同道，更有來自社會大眾的支持。不惟使反對派人士有一種歸屬感，持贊成態度的群眾也有一種認同感。如此，一方面可以共同承擔壓力；另一方面，個人經常會在團體中做出平時他們不會單獨做，或沒有勇氣做的事，例如發表突破政治禁忌的言論、參加政治反對活動等。透過集體行動可以增加個人政治行動的安全感，黨外的集體行動的確使國民黨政府在策畫對黨外個人或團體進行鎮壓時，持比較謹慎的態度，因為考慮到可能會付出較大的代價。<sup>131</sup>以上是整合動員的消極作用，至

<sup>129</sup> 這兩種不滿有顯著的結合與加乘的作用，使得自《臺灣政論》以降的政治反對運動，逐漸發展成為一種對抗一黨專政威權政府的民族主義式運動。

<sup>130</sup> 林佳龍認為臺灣反對運動是一種以本土人士為主體，帶有強烈臺灣意識的反體制民主化運動；王甫昌也指出反對運動是以省籍不平等及「本土化」為訴求來動員支持者，具有強烈的「臺灣民族主義色彩」。林佳龍：〈威權侍從政治體制下的臺灣反對運動—民進黨社會基礎的政治解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卷1期，頁126。王甫昌：〈族群同化與動員〉，《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77期（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民國83年），頁7。

<sup>131</sup> Dahl提出「鎮壓成本」／「容忍成本」的分析概念：政府在準備鎮壓反對力量時，經常需要考量這兩項成本，再決定如何採取行動。參見Robert A. Dahl,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15. Dahl又指出：當鎮壓的代價愈高於寬容的代價，則建立競爭性政權的機會愈大。從《臺灣政論》創刊至民進黨成立這段期間的政治發展而論，Dahl的推論是正確的。Robert



於整合動員的積極作用則具體表現在各種政治參與上，下文將舉「雜誌論政」、「配合選舉」為例，試加說明。

透過《臺灣政論》的創辦與發行，以及對選舉的配合，使向來分散的反對力量，重新做了一次頗具歷史意義的整合與動員。首先，整合動員的對象包括老中青三代，<sup>132</sup>不論在經驗上或精神上，都具有承先啟後的重大作用。特別是讓黨外新生代首次充分結合，而且同時經驗到雜誌與選舉這兩種主要的運作方式，對後來的反對運動產生重要影響。<sup>133</sup>其次，雖然這樣的結合相較於一九七〇年代末期的「臺灣黨外人士助選團」（1978年）、「美麗島政團」（1979年）等黨外團體，還是相當鬆散且無約束性，也沒有明顯的組織化，但畢竟為後來黨外的組織化，奠定良好的根基，同時也做了一次很好的示範。復次，由於整合動員的主要基礎之一是「臺灣主體意識」，因此整合動員的對象絕大部分是本土人士，也導致罕見的本土人士大規模集體政治行動，成為黨外運動中族群動員的發端。最後，由《自由中國》和《大學雜誌》分別策動的兩次政治反對運動之所以失敗的主要原因，都在於沒有真正和本土群眾結合，且缺乏社會基礎。以《臺灣政論》為濫觴的黨外運動一開始就盡力尋求群眾的支持，<sup>134</sup>選擇植根在堅實的社會基礎上，終能逐步發展壯大，建立反對黨，並透過和平選舉的民主管道成為今日的執政黨。

## （二）擴大政治參與

### 1. 雜誌論政

由於國民黨政府長期以來積極而嚴厲地封禁，除了選舉以及當選後的議會論政之外，反對派人士，尤其是本土人士，普遍缺乏表達意見和參與政治的管道。《臺灣政論》的發行開闢了一條新的門徑，增加反對派人士參政的機會。蘇慶黎回憶：

A. Dahl,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s", in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ed.,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Mas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 1975), p.123.

<sup>132</sup> 郭雨新是老一輩的黨外，黃信介、康寧祥和張俊宏等則是中生代，而《臺灣政論》的讀者和義工如陳菊、田秋堇、邱義仁、吳乃仁、吳乃德、周婉窈、謝明達、蕭裕珍、林正杰、李筱峰、賀端蕃、范巽綠和蘇煥智等人，都是幫郭雨新助選的基本成員，也是後來「黨外新生代」的中堅分子。參見新臺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編：《走向美麗島——戰後反對意識的萌芽》，各關係人訪問部分。

<sup>133</sup> 這批黨外新生代後來大部分都參與公職人員選舉和創辦黨外政論雜誌。

<sup>134</sup> 發行雜誌仍與群眾運動有本質上的區別，而且較為穩健。雜誌一方面可以藉增加發行人數，吸引更多民眾的認同和支持，擴展影響力；他方面，雜誌的發行量和雜誌社的擴張皆可適當節制，不像群眾運動容易失控。

《臺灣政論》雖然只有幾期，但對臺灣歷史來講是一個滿大的分水嶺。雷震被逮捕後，臺灣只能透過每隔幾年舉行一次的選舉，表達一點反對的氣息。到了《臺灣政論》，臺灣的民主政治開始進入比較有計劃、有步驟、有策略而且比較有理論系統的反對運動；這種反對運動不只是一個純粹選舉的運動。……從《臺灣政論》之後，不管有沒有選舉，這個反對運動都可以透過辦雜誌來持續。<sup>135</sup>

選舉有制度有定時，「選舉假期」短暫且不常有，而國民黨在國會和地方議會中又占有多數優勢，反對意見較不受重視，也不被一般媒體報導，以致無法突顯其作用；因此選舉和議會論政都有一定的限制與被動性。相對之下，雜誌論政就顯得主動而有彈性，也較能完整、深入、持久和集中地表達反對意見。再者，雖然雜誌論政較傾向對政治運動做間接或邊際性的參與，即使如此也導致往後越來越多的直接而實際的參與。更多的參與又經常可以衝決網羅，開拓更寬廣多元的參政管道和範圍，如組黨、<sup>136</sup>街頭抗爭、社會運動等，<sup>137</sup>終至全面而整體地衝擊國民黨的黨國體制與政權。<sup>138</sup>

尤有進者，《臺灣政論》還為往後黨外政論雜誌和政治反對運動樹立一個雜誌論政的模式，而且這個論政模式是一個迥異於《自由中國》、《大學雜誌》等雜誌論政傳統的新典範。因為它不單單向上面要求政府改革，同時還致力嘗試往基層號召群眾、引導群眾，甚至塑造群眾、動員群眾。<sup>139</sup>

## 2. 配合選舉

<sup>135</sup> 新臺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編：《走向美麗島——戰後反對意識的萌芽》，頁112-113，蘇慶黎訪問部分。

<sup>136</sup> 關於組黨運動可參見周琇環、陳世宏主編：《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二)組黨運動》（臺北：國史館，民國89年12月）。

<sup>137</sup> 蕭新煌：〈民間社會的『反支配』性格——社會運動本質的界定〉，《中國論壇》，331期（民國78年），頁60-64；吳介民：《政體轉型期的社會抗議：臺灣一九八〇年代》，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79年。吳介民認為社會運動與政治反對運動之間有著「互相掩護」的關係，即相互動員、相互增援，逐漸擴大臺灣人民政治參與和實踐的空間，逐步建立代議民主體制的錐型。

<sup>138</sup> 杭廷頓認為一黨制國家的穩定性，可由該國擁有多少可將政治異議者轉化成政治參與者的管道來判斷，但也有一定的限度。Samuel P. Huntington,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One-Party System", in Samuel P. Huntington and Clement H. Moore, ed., *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 The Dynamics of Established One-Party System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0), p.44.

<sup>139</sup> Linz指出，要讓威權政體自由化，必須有讓政治反對者接近「大多數民眾」的制度化管道。Juan 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ed.,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 Macropolitical Theory*,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 1975), p. 273.

在戒嚴時期，選舉是政府首先開放給本土人士的極少數參政途徑之一，也一直是反對人士最重要的參政管道；最後也是透過選舉的方式，終結了國民黨一黨獨大專政的局面，使臺灣進入政黨制度性輪替的政黨政治新時代。<sup>140</sup>

《臺灣政論》十分重視選舉在民主運動的作用，強調選舉活動在民主政治運作方面的重要性，成員常以基層民眾的代言人自居。<sup>141</sup>《臺灣政論》密切配合1975年底的第二屆立法委員增額選舉，從首期開始就提供黨外候選人如康寧祥、黃順興和郭雨新等論政宣傳的園地，<sup>142</sup>並再三呼籲政府要用負責任的態度，以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辦好這次選舉。12月的第五期特別發行「選舉特大號」專刊，幫助黨外參選人在文宣上對抗國民黨，並提醒民眾嚴防國民黨政府作弊，給予國民黨相當大的壓力。選舉前夕更是以人力、物力等各項資源，充分支援黨外候選人。<sup>143</sup>

《臺灣政論》與這次選舉的配合，開創了兩個先例：一是政論雜誌成為黨外候選人的競選宣傳工具，二是政論雜誌的創辦人、負責人或撰稿人等重要關係人親自參加選舉。這對往後黨外政論雜誌和民主運動的發展都有深遠的影響。首先，選舉的演講由於有時間限制，不可能深入說明學理，建立體系等，雜誌則有充分的篇幅可供補足，藉以吸引更多的知識分子

<sup>140</sup> 國民黨政府開放選舉的原因很多，無法一一詳析，僅略述與本文較有關係的三項：第一，選舉是民主制度的象徵，因此辦理選舉具有政治宣傳的作用，顯示中華民國是「自由中國」，有別於「共產中國」。第二，因為國民黨政府原本與臺灣社會缺乏淵源關係，透過選舉可與地方勢力結合，獲得地方菁英的支持與合作，並進一步吸納之。第三，確立統治的正當性。參見Nai-tne Wu（吳乃德），“*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 System: 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pp196-197；Authur J. Lerman，“National Elite and Local Politician in Taiwa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1: 4 (1968), 1406-22.

<sup>141</sup> 陳鼓應：〈臺灣新生一代的改革運動（中）〉，《中報月刊》，頁33。

<sup>142</sup> 還以刊登新書廣告的方式為候選人做宣傳，如康寧祥的《問政三年》、黃順興的《湖濱雜思》和《國會與我》等。此外，也藉由登載分析選情文章的方式，較不著痕跡地推薦各地的黨外參選人；如金曲辰：〈區域立委增選大勢〉，《臺灣政論》，5期，頁13-15；金文吉：〈為自由候選人人士助陣〉，《臺灣政論》，4期，頁16-18。

<sup>143</sup> 例如黃信介總調度，張俊宏負責整個文宣工作，張金策等一組人協助康寧祥，黃華等一組人協助郭雨新。郭雨新的競選文宣是由張俊宏主導，周弘憲、張金策、黃華，江春男都是班底，為他助選的大部分都是《臺灣政論》的讀者和義工。參見新臺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編：《走向美麗島——戰後反對意識的萌芽》，頁32-33，陳菊訪問部分。另參考黃華先生於2001年5月24日接受筆者口述歷史訪問的紀錄。郭雨新的政見幾乎是從《自由中國》到《臺灣政論》政治反對意見的總結，參見李筱峰：《臺灣民主運動四十年》，頁118-120。

。其次，雜誌可以藉著「選舉假期」的「保護傘作用」（umbrella effect），<sup>144</sup>升高言論，突破禁忌，擴大對民主理論和反對意見的宣傳；同時也能趁機強化雜誌的內容與品質，招募支持者，發展雜誌社組織和反對勢力。復次，《臺灣政論》之前的政論雜誌，成員及作者幾乎都迴避參加公職選舉和一般的政治活動，《臺灣政論》的重要關係人卻在此次選舉中主動積極投入選戰。往後各次選舉也踴躍參加，並在當選後以公職身分保護雜誌，使雜誌能夠繼續成長，或另行創辦雜誌，並結合其他黨外雜誌的力量，促成由量變達到質變，形成一股重要的反對勢力。以上三點都對提升政論雜誌和民主運動的素質與力量有正面作用。最後，雜誌若與選舉活動過度結合，就會淪為私人謀取政治利益的工具，例如後來有不少政論雜誌都是為選舉而發行的，已失去做為公共論壇的客觀立場。

這次選舉的結果，以黨外名義當選的有康寧祥、黃順興和許世賢。郭雨新的落選，引發了宜蘭地區支持者的集體抗議，險些釀成群眾暴動。<sup>145</sup>一九七〇年代中期以前，臺灣的反對派人士通常都是單打獨鬥，欠缺整體而有系統的組織或運動，因此無法有效壓迫國民黨政府進行民主改革，頂多只在地方選舉中造成些許競爭壓力。《臺灣政論》配合選舉與郭雨新落選的經驗，給予黨外最大的啟示就是必須以組織化加強集體的力量，突破舊有的地方性格局（另一項重要啟示就是見識到群眾運動的力量）。<sup>146</sup>所以才有1977年舉行地方五項公職人員選舉時，黃信介、康寧祥遍跡全省為黨外候選人助選，開始形成全島串聯的模式；<sup>147</sup>1978年成立「臺灣黨外人士助選團」，以各地候選人提出共同政見的方式來塑造一個整體黨外集團的形象；以及自1979年「美麗島政團」起，至1986年民主進步黨成立為止，其間一連

<sup>144</sup> Charles Tilly,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Mas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 1978), p.167.

<sup>145</sup> 參見林義雄、姚嘉文：《虎落平陽—選戰、官司、郭雨新》（臺北：著者自印，民國66年8月）。

<sup>146</sup> 倘若這次選舉有更多的黨外人士當選，以《臺灣政論》整合的基礎，未始不能提早進行組織化及大範圍的串聯，走出過度倚重北部都市化地區的局限。黃華先生於2001年5月24日接受筆者口述歷史訪問時表示，他有在東部（宜蘭）、中部（臺中）和南部（高雄）設立分社的打算，從事類似後來施明德所做的組織工作，這也可能是他被抓的原因之一。

<sup>147</sup> 高棟民認為1977年的選舉（戰後臺灣規模最大的一次選舉）及「中壢事件」，是臺灣現代史一個重要的分水嶺，是「一個歷史階段的結束」與「一個新時代的開始」。Thomas B. Gold,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 p.3, pp.114-117.筆者以為這兩個事件與《臺灣政論》的配合選舉和因郭雨新的落選引起的群眾抗議事件，均有極大的相似性與關聯。另外，李筱峰認為：「中壢事件使部分黨外運動者察覺到群眾力量的存在，認為民心可用，但也使部分黨外運動者意識到群眾行為所隱藏的內在危險性。因此，自《臺灣政論》開始起，由康寧祥和黃信介所連線形成的黨外運動的領導主軸，經此事件後逐漸呈現鬆散的現象」。李筱峰：《臺灣民主運動四十年》，頁125。

串的組織化運動，漸次對國民黨政權構成集體性的壓力與挑戰。<sup>148</sup>

## 伍、結語

《臺灣政論》是國民黨政府遷臺後，臺灣第一本由本土菁英創辦的政治性異議雜誌，也是往後一系列黨外政論雜誌的源頭，同時又是本土人士第一次有系統、有目標、有計畫地集體表達對國事和政情的看法；而由《臺灣政論》結合的新一代本土菁英所從事的政治反對運動，也成為黨外運動的肇端，使戰後臺灣民主運動進入一個以本土人士為主體並主導的新階段。因此，《臺灣政論》極具開創性的象徵意義。

除了高度象徵意義外，《臺灣政論》還對戰後民主運動產生相當重要的實際影響：

第一、一九七〇年代，臺灣整體環境開始朝有利於「自由化」、「民主化」與「本土化」的方向發展，《臺灣政論》起於這個變動的時代，同時也對促進「自由化」、「民主化」與「本土化」的發展的起了很大的回饋作用。

第二、《臺灣政論》成為黨外雜誌論政的典範，也為往後的政治反對運動定下基調。特別是《臺灣政論》最重要的言論方向和內容——「自由」／「自由化」、「民主」／「民主化」、「臺灣問題」／「本土化」，也成為黨外雜誌及政治反對運動最主要的訴求和目標。

第三、在《臺灣政論》實際參與民主運動的過程中，對往後政治反對運動所採取的幾種主要運動方式，如參與選舉、議會問政、發行雜誌、群眾運動及街頭抗爭等，都已充分運用，或預示其運作可能性。也在某些方面顯示了反對運動與國民黨政府互動關係的原型。

第四、對於政治反對勢力與反對運動而言，《臺灣政論》證明黨外雜誌除了宣傳、啟蒙的作用外，還兼具招募人才、訓練成員、籌措財源、組織動員等功能，並提供一個可資團結凝聚的組織核心，使反對運動能夠發揮集體的力量。<sup>149</sup>

<sup>148</sup> 參見周琇環、陳世宏主編：《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二)組黨運動》，2章。

<sup>149</sup> Berman認為黨外政論雜誌事實上發揮了反對黨組織的作用，「促進了臺灣政治制度從不願公開面對政治挑戰的威權主義向比較民主的政治制度的相對平穩過渡。當時機成熟時，一個比較成熟發達的反對運動得以脫去媒體的外殼而宣告誕生，從而使向政治多元化的過渡得以平穩進行」。包澹寧著、李連江譯：《筆桿裡出民主——論新聞媒介對臺灣民主化的貢獻》，頁90。黨外雜誌也顯示，除了經由選

《臺灣政論》所揭櫫的「自由化」、「民主化」和「本土化」的目標，在今日大抵都已達成。臺灣已經民主轉型成功，目前所要努力的是如何鞏固和深化這得來不易的民主成果，也就是近年來大家熱烈討論的「民主轉型與鞏固」（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的問題。<sup>150</sup>民主鞏固包括「形式（程序）民主」的確立與健全，並進一步提升「實質民主」的內涵與品質，以及最重要的，使民主觀念深入社會及個人心理，成為生活的一部分，亦即建立一種健全穩定的「民主體制」及自由多元的「民主文化」。<sup>151</sup>

在臺灣民主轉型的過程中，由於國民黨政府同時兼具政治支配集團（表現在威權體制上）和外來政權（表現在大中國意識上）兩個屬性，使得反對運動一開始就具有民主與民族的雙重特性，將「自由化」、「民主化」和「本土化」視為互補的政治主張。在進行政治動員時，也能同時兼顧臺灣意識的感性號召，以及自由民主的理性訴求。<sup>152</sup>然而，原本簡單的「臺灣主體意識」逐漸發展成為一種含有多重意義的民族主義——「臺灣國族主義」，遂與自由主義逐漸產生分歧，有時甚至針鋒相對。<sup>153</sup>另一方面，民主化過程也升高了統獨爭議，以及「臺灣國族主義」與「中國國族主義」的對抗。在國民黨和民進黨同時都以「國家認同」為主軸，刻意進行政治動員之下，臺灣內部的社會歧異愈發明顯；<sup>154</sup>民主政治更是一度偏向「民粹主義」（populism；或「民粹主義式民主」plebiscitarian democracy），模糊了

舉在國會內造政黨外，組黨還可能有其他的外塑力量。

<sup>150</sup> 參見田弘茂主編：《鞏固第三波民主》（臺北：業強出版社，民國86年10月）；田弘茂主編：《新興民主的機遇與挑戰》（臺北：業強出版社，民國86年10月）；游盈隆主編：《民主鞏固或崩潰》（臺北：月旦出版社，民國86年10月）；林佳龍、邱澤奇主編：《兩岸黨國體制與民主發展》（臺北：月旦出版社，民國88年9月），等書之相關論文。

<sup>151</sup> Linz和Stepan認為民主鞏固涉及行為、態度和憲政三個層面，透過這些層面的鞏固，使得民主運作常規化，並深入社會、制度和心理生活上，以及成為政治人物與團體行事和從政的內在規範。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5.

<sup>152</sup> 蕭高彥：〈國家認同、民族主義與憲政民主：當代政治哲學的發展與省思〉，收入殷海光基金會主編，《市民社會與民主的反思》（臺北：桂冠圖書公司，民國87年8月），頁182。

<sup>153</sup> 參見錢永祥：〈自由主義與國族主義：兩種政治價值的反思〉，收入黃榮村等著，《邁向公與義的社會》，上冊（臺北：時報文化公司，民國89年2月），頁372-404，包括王杏慶、邱義仁、黃光國等人的回應文；江宜樺：〈自由民主體制下的國家認同〉，收入殷海光基金會主編，《市民社會與民主的反思》，頁103-159。

<sup>154</sup> 「國家認同」（臺灣人或中國人）又與「族群認同」（本省人或外省人）、「國家定位認同」（統一或獨立）、「政黨認同」（國民黨、民進黨或其他政治團體）等政治態度取向，相互牽纏影響。



民主憲政的原貌。<sup>155</sup>原本相輔相成，互相補足的「自由化」、「民主化」和「本土化」的政治主張，隨著現實政治的變遷，幾經發展而改變內容，反而在民主轉型成功後出現罅隙與矛盾，成為民主鞏固的隱憂。

「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或稱「公民社會」）對民主政治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視。活潑多元、自由健全的市民社會可以提供自由表達的空間，增加人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補充代議民主的不足，並監督政府，平衡國家權力，有助於民主鞏固，以及建立民主體制和民主文化，防止重返威權統治。市民社會最重要的機制是「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透過公共領域，人民能以平等、多元、公開的原則，自由表達、溝通意見，理性地對公共事務進行討論或批評，以形成民意或共識；並自主地形成公共組織，集體表達公共意見（public opinion），影響政治和社會。<sup>156</sup>在公共領域中，最能凝聚共識、化解衝突，並設法以「多元主義」（pluralism）調和各種矛盾，包括上述「自由化」、「民主化」和「本土化」的矛盾。公共領域又是一種論述領域（discursive field），其中最重要的形式應該是做為公共論壇的媒體，政論雜誌是其中之一。至此，我們不禁回想到《臺灣政論》，以及《臺灣政論》創刊時那種多元、包容的精神。

誠如本文開頭Jens Bartelson引語所揭示的奧義，《臺灣政論》就像一把鑰匙，雖然小，卻可開啟一扇重要的門，通往充滿各種可能的廣大領域，而這個領域不只是政治的，更是知識的。

<sup>155</sup> Doyle曾指出：我們雖然努力去建立一個讓民主能夠安全的世界，並不必然可以保證民主對這個世界是安全的。Michael W. Doyle, "An International Liberal Community", in Graham Allison and G. Treverton, ed., *In Rethinking American's Security: Beyond Cold War to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 1992), pp.307-337.

<sup>156</sup> Ju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Cambridge: MIT Press, 1989).

## 徵引書目

### (一)專書

王拓，《黨外的聲音》。臺北：長橋出版社，民國67年。

王振寰，《誰統治臺灣？—轉型中的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臺北：巨流圖書公司，民國85年。

田弘茂主編，《鞏固第三波民主》。臺北：業強出版社，民國86年10月。

田弘茂主編，《新興民主的機遇與挑戰》。臺北：業強出版社，民國86年10月。

李筱峰，《臺灣民主運動四十年》。臺北：自立晚報社，民國76年10月。

呂秀蓮，《重審美麗島》。臺北：自立晚報社，民國80年12月。

杭之（陳忠信），《邁向後美麗島的民間社會》。臺北：唐山出版社，民國79年4月。

林佳龍、邱澤奇主編，《兩岸黨國體制與民主發展》。臺北：月旦出版社，民國88年9月。

林義雄、姚嘉文，《虎落平陽一選戰、官司、郭雨新》。臺北：著者自印，民國66年8月。

周琇環、陳世宏主編，《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二）組黨運動》。臺北：國史館，民國89年12月。

南方朔（王杏慶），《民主不是夢》。臺北：新新聞周刊雜誌社，民國78年2月。

姚嘉文，《護法與變法》。臺北：長橋出版社，民國67年。

張俊宏，《我的沉思與奮鬥—三千個煎熬的日子》。臺北：著者自印，民國66年10月，再版。

陳國祥、祝萍，《臺灣報業演進四十年》。臺北：自立晚報社，民國76年10月。

彭明敏，《自由的滋味》。臺北：彭明敏文教基金會，民國84年1月，再版。

游盈隆主編，《民主鞏固或崩潰》。臺北：月旦出版社，民國86年10月。

黃嘉樹，《國民黨在臺灣1945-1988》。臺北：大秦出版社，民國83年。

葉柏祥，《黃信介前傳》。臺北：月旦出版社，民國83年6月。

新臺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編，《走向美麗島—戰後反對意識的萌芽》。臺北：時報文化公司，民國88年11月。

新臺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編，《暴力與詩歌—高雄事件與美麗島大審》。臺北：時報文化公司，民國88年11月。

新臺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編，《沒有黨名的黨—美麗島政團的發展》。臺北：時報文化公司，民國88年11月。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資料中心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社會關懷文獻1971—1988》。

臺北：人間出版社，民國87年9月。

薛月順、曾品滄、許瑞浩主編，《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一)從戒嚴到解嚴》。臺北：國史館，民國89年12月。

鄭瑞城：《透視傳播媒介》。臺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民國77年。

蕭新煌：《社會力—臺灣向前看》。臺北：自立晚報社，民國78年7月。

龔宜君，《「外來政權」與本土社會——改造後國民黨政權社會基礎的形成》。臺北：稻鄉出版社，民國87年8月。

## (二)期刊、論文

《臺灣政論》，第一期，民國64年8月，再版。

《臺灣政論》，第二期，民國64年9月。

《臺灣政論》，第三期，民國64年10月。

《臺灣政論》，第四期，民國64年11月。

《臺灣政論》，第五期，民國64年12月。

八十年代雜誌社編輯部，〈中國民主運動發展史(二)——臺灣部分〉，《八十年代》，第四卷第一期（民國71年2月）。

王甫昌，〈族群同化與動員〉，《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七期（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民國83年）。

王甫昌，〈臺灣反對運動的共識動員：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年兩次挑戰高峰的比較〉，收入《臺灣政治學刊》，創刊號（民國85年7月）。

王杏慶，〈《大學雜誌》與現代臺灣：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三年的知識份子改革運動〉，收入澄社編，《臺灣民主自由的曲折歷程》（臺北：自立晚報出版社，民國81年）。

王振寰，〈臺灣的政治轉型與反對運動〉，《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二卷第一期（民國78年，春季號）；以及該文所提及的彭懷恩、林嘉誠、胡佛、游盈隆、張茂桂、林佳龍等人的論文。

王振寰，〈廣播電視媒體的控制權〉，收入鄭瑞城、王振寰等合著，《解構廣電媒體——建立廣電新秩序》（澄社報告2）（臺北：允晨出版社，民國82年5月）。

王振寰、錢永祥，〈邁向新國家？——民粹威權主義的形成與民主問題〉，《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二十期（民國84年8月）。

田弘茂，〈威權政黨國家的轉型——臺灣的發展經驗〉，收入張京育主編，《中華民國民主化——過程、制度與影響》（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民國81年3月）。

江宜樺，〈自由民主體制下的國家認同〉，收入殷海光基金會主編，《市民社會與民主的反思》（臺北：桂冠圖書公司，民國87年8月）。

李祖琛，〈大眾媒體與政治反對運動〉，《中國論壇》，第二七四期（民國76年2月25日）。  
李筱峰，〈臺灣政治革新運動與知識份子〉，《進出歷史》（臺北：稻鄉出版社，民國81年10月）。

呂亞力，〈臺灣的反對黨：民進黨的發展〉，收入張京育主編：《中華民國民主化——過程、制度與影響》（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民國81年3月）。

吳介民，《政體轉型期的社會抗議：臺灣一九八〇年代》，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79年。

吳乃德、林佳龍，〈中產階級與民主改革：現實或神話？——重構中產階級與民主化的關係〉，收入蕭新煌主編，《變遷中臺灣社會的中產階級》（臺北：巨流圖書公司，民國78年）。

林佳龍，〈威權侍從政治體制下的臺灣反對運動——民進黨社會基礎的政治解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二卷第一期（民國78年，春季號）。

胡適，〈自由中國的宗旨〉，《自由中國》，第一卷第一期（民國38年11月）。

高承恕，〈臺灣新興社會運動結構因素之探討〉，收入徐正光、宋文里等編，《臺灣新興社會運動》（臺北：巨流圖書公司，民國78年）。

韋政通，〈三十多年來知識份子追求自由民主的歷程——從《自由中國》、《文星》、《大學雜誌》到黨外的民主運動〉，收入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主編，《臺灣地區社會變遷與文化發展》（臺北：中國論壇雜誌社，民國74年10月）。

夏潮論壇雜誌社編輯部，〈黨外雜誌的昨日、今日、明日——總評黨外十本刊物〉，《夏潮論壇》，總號第四十九號（民國73年10月）。

陳鼓應，〈臺灣新生一代的改革運動（中）〉，《中報月刊》（民國71年6月）。

張炎憲，〈美麗島事件與臺灣民主運動的轉折〉，「邁向二十一世紀的臺灣民族與國家」研

討會論文（民國88年12月21日至23日召開於臺北國家圖書館會議廳）。

張茂桂，〈「知識份子」與社會運動〉，《變遷中臺灣社會的中產階級》（臺北：巨流圖書公司，民國78年）。

新臺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編，〈張俊宏先生訪談摘錄〉，未刊稿。  
雷震，〈我們五年來的工作重點〉，《自由中國》，第十一卷第十期（民國43年11月）。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我們的呼籲〉，《臺灣教會公報》，第一二三〇期（民國64年9月28日）。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人權宣言〉，《臺灣教會公報》，第一三二九期（民國66年8月16日）。歐陽聖恩，〈無黨籍人士所辦政論雜誌在我國政治環境中角色功能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75年。

錢永祥，〈自由主義與政治秩序：對《自由中國》經驗的反省〉，《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一卷第四期（民國77年，冬季號）。

錢永祥，〈自由主義與國族主義：兩種政治價值的反思〉，以及王杏慶、邱義仁、黃光國等人的回應文，收入黃榮村等著，《邁向公與義的社會》，上冊（臺北：時報文化公司，民國89年2月）。

薛化元，〈《自由中國》雜誌歷史定位的再思考〉，收入歷史學會編，《史學與國民意識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民國88年）。

魏誠，〈民國四、五十年代臺灣政論雜誌的發展：《自由中國》半月刊內容演變與政治主張〉，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73年6月。

蕭全政，〈國民主義：臺灣地區威權體制的政經轉型〉，收入《中國的民主前途：臺灣地區政治民主化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財團法人民主文教基金會，民國80年3月）。

蕭全政，〈臺灣威權體制轉型中的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收入中央研究院臺灣研究推動委員會主編，《威權統治的變遷——解嚴後的臺灣》（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民國90年3月）。

蕭高彥，〈國家認同、民族主義與憲政民主：當代政治哲學的發展與省思〉，收入殷海光基金會主編，《市民社會與民主的反思》（臺北：桂冠圖書公司，民國87年8月）。

蕭新煌，〈臺灣新興社會運動的剖析：自主性與資源分配〉，收入蕭新煌等著，《壟斷與剝削—威權主義的政治經濟分析》（臺北：臺灣研究基金會，民國78年）。

蕭新煌，〈民間社會的『反支配』性格——社會運動本質的界定〉，《中國論壇》，第三三一期（民國78年）。

羅世宏，〈後蔣經國時代的國家、大眾媒介與反對運動：國家認同議題的媒介框架分析〉，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83年6月。

### (三)西文資料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y : Reflection of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 Verso, 1983.

Berman, Daniel K., *Words Like Colored Glass—The Role of the Press in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Westview Press Inc., 1992. 包澹寧著，李連江譯，〈筆桿裡出民主——論新聞媒介對臺灣民主化的貢獻〉。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84年3月，初版。

CEPD : *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1989*, Taipei :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 Executive Yuan, 1989.

Chao, Linda and Ramon H. Myers, *The First Chinese Democracy : Political Lif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Baltimore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蔡玲、馬若孟著，羅珞珈譯，〈中國第一個民主體系〉。臺北：三民書局，民國87年10月。

Cheng, Tun-jen, " *The Politics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 The Case of the East Asian NICs*,"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87.

Chou, Yangsun, and Andrew Nathan, "Democratizing Transition in Taiwan," *Asian Survey*, 27 : 3, March, 1987.

Cole, Allen, "Political Roles of Taiwan Enterpriser," *Asian Survey*, 7 : 9 ( 1967 ) .

Copper, John 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in Hungdon Chiu, ed., *China and Taiwan Issue*, New York : Praeger, 1979.

Dahl, Robert A., *Polyarchy :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Dahl, Robert A.,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s" , in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ed.,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Mass. :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 1975.

Doyle, Michael W., "An International Liberal Community", in Graham Allison and G. Treverton ed., *In Rethinking American's Security : Beyond Cold War to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 Norton



- & Company, 1992.
- Gold, Thomas B.,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 New York : M. E. Sharpe Inc., 1986.
- Goldstein, Carl, "The Straight and Narrow : Newspapers Walk a Tightrope to Stay Clear of KMT Constraints" ,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6 December 1985.
- Habermas, Jurgen,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Cambridge : MIT Press, 1989.
- Huntington, Samuel P.,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One-Party System" , in Samuel P. Huntington and Clement H. Moore, ed., *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 : The Dynamics of Established One-Party Systems*, New York : Basic Books, 1970.
- Huntington, Samuel P., *The Third Wave :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 Lazarsfeld, Paul, and Robert Merton, "Mass Communication, Popular Taste and Organized Social Action" , in Lyman Bryson , ed., *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 New York : Institute for Religious and Social Studies, 1948.
- Lerman, Authur J., "National Elite and Local Politician in Taiwa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1 : 4, 1968.
- Linz,, Juan,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e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 Science*, Vol.3, Macropolitical Theory, Reading , Mass. :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 1975.
- Linz,, Juan,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Baltimore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 Metzger, Thomas A., "The Chinese Reconciliation of Moral-sacred Values with Modern Pluralism Political Discourse in the ROC, 1949-1989," in Ramon H. Myers, ed., *Two Societies in Opposition :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fter Forty Years*, Stanford :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1.
- Pye, Lucian,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Cambridge : Th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Schmitter, Philippe C., "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 " in P. C. Schmitter and G. Lehmbruch, ed. , *Trend toward Corporatism Intermediation*, Beverly Hill : Sage, 1979.
- Schramm, Wilbur , *Mass Media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in the*

- Developing Countries*,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 Sreberny-Mohammaadi, Ammabelle,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 in James Curran and Michael Gurevitch, ed., *Mass Media and Society*, New York : Routledge, 1991.
- Tilly, Charles,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Mass. :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 1978.
- Tsang, Steve, "Chiang Ching-Kuo, the Nature of the Kuomintang and the Democratic Breakthrough in Taiwan" , 收入中央研究院臺灣研究推動委員會主編,《威權統治的變遷——解嚴後的臺灣》。
- Wade, Robert, *Governing the Market :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New Jersey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 Winckler, Edwin A.,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on Taiwan : From Hard to Soft Authoritarianism ? " *The China Quarterly*, no.99, September, 1984.
- Wu, Nai-tne, " *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 System : 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Ph.D.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7.